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 年会

3 月 23 日-25 日

3 月 23 日

以开放引领未来

主持：余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发言：韩文秀（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蒂姆·库克（Apple 首席执行官）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瑞·达利欧（美国桥水投资公司董事长）

科鲁格（宝马集团董事长）

主持人（余斌）：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主办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出席经济峰会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本单元讨论的主题是：以开放引领未来。

去年，中国隆重庆祝了改革开放 40 周年，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为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同呼吸、共命运，在深刻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将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将开放与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确立为五大新发展理念。

当前，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都面临不少挑战，经济增速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失

调等等，应对这些挑战，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开放引领未来，在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五位嘉宾，让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对以“开放引领未来得看法”。他们分别是：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 韩文秀先生

Apple 公司首席执行官 蒂姆·库克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李稻葵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董事长 瑞·达利欧先生

宝马集团董事长 科鲁格先生，让我们对五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韩文秀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来宾：首先，热烈祝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开幕。

过去 40 年，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和主动力。在对外开放和国内改革之间，形成了正反馈循环，开放对于改革具有引领方向和塑造动力的重要作用。

1978 年前后，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曾先后密集访问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打开国门看世界，看到了世界的精彩，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带来超乎想象的深刻触动，因此毅然决然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40 年来，中国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不断强化一个认知：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这一点。这个道理在古今中外恐怕都适用。

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科技进步加快，地球越来越小，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真是“天涯若比邻”，难舍难分。

对于各国和广大企业来讲，面向未来、赢得未来，走开放合作之路是共同的乃至唯一的最优选择。

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中国对外开放 40 年的历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在加入 WTO 之前，我们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扩大开放范围、丰富开放内涵，为国内经济改革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加入 WTO 之后，我们在遵循国际规则的前提下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形成强大倒逼机制，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促进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当前，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多边谈判，也在与有关国家开展经贸磋商，商谈双边投资协定

或自由贸易区安排，开放的广度、深度、维度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下一步的对外开放是什么模样，有什么特征，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理解。

第一，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是更加互利共赢的开放。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将继续缩减，外资将能够进入更大市场空间、更多产业领域，享有充分的国民待遇。

我们乐见更多的外商独资企业，也乐见更多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合资、合作企业。我们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让更多的伙伴参与和受益。

我们主张在开放合作中做大蛋糕、共享蛋糕，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

第二，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是更加知行合一的开放。

我们一向讲求“言必信，行必果”。我们将加快修改完善国内法律法规，以法定、规范的方式将对外开放举措固定下来，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侵权行为的处罚等，这也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企业的内在要求。

我们愿与有关各方强化落实和监督相互开放的承诺，我们不开空头支票，我们是行动派。我们要认真实施《外商投资法》，加快制定配套措施，这将成为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一个里程碑。

第三，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是更加一视同仁的开放。

各类市场主体都是价值的创造者，是全球供应链的参与者。我们将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按照竞争中性原则，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搭建公平竞争的舞台。

我们一如既往公平对待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各国投资者，推进双边合作不会损害第三方利益，而且要创造更多的三方合作、多方合作的机遇和平台，努力实现多赢共赢、有福同享。

第四，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是更加内外联动的开放。

我们直面贸易平衡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并通过苦练内功加以解决。

中国要建立强大的国内市场，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势必增加国外有竞争力的优质产品进口，更好实现贸易平衡。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消费升级，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 GDP 的比例已由 2007 年的 10% 下降至 2018 年的 0.3%。

开放往往倒逼被动的改革变为主动的改革，明天的改革变为今天的改革。对外经贸磋商中的结构性议题与中国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高度关联性，我们要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和决心，加强统筹谋划，以解决结构性议题为契机，变外部压力为内生动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一举多得。

第五，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更加注重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要求，表明了我们推动高水平开放的雄心。

我们要持续扩大货物和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同时，要借鉴和对标国际先进经验，提升和完善我国的经贸规则、标准等制度环境，使之更加市场化、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高端化。

我们要积极参与 WTO 改革，推动完善国际经贸规则，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构建能够赶上时代、适应未来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

最后，中国经济正处于总量大而人均小的特殊演变时期。中国渴望成为发达国家，而且将来一定会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但目前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基本事实。

发展中国家不是自封的、自选的，而是有客观标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 GDP 只有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的 23%左右，贫困线标准不足美国的 10%，在北京周边 100 公里之外就有一个环首都贫困带。

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我们正在按照习近平主席的决策部署，加大脱贫攻坚力度，着力办好自己的事。

同时，我们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反对保护主义，倡导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和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愿意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包括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

我们深刻意识到，开放是国家兴盛之路，开放是人民幸福之路，开放是合作共赢之路，开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

40 年前我们走上这条路，从此没有回头路。

在新时代的中国，以高水平开放带动结构性改革，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以开放引领未来”的必然逻辑。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谢谢。



蒂姆·库克（Apple 首席执行官）

早上好！非常感谢韩文秀主任以及余斌主任今天早上的发言。

中国的发展在塑造经济机遇以及经济联动上，在过去的 20 年当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今天本次会议当中各位的到来对于未来的持续进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曾经在几年前也在西雅图和美国人民说道：“如果人人都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火势一定会涨得更高。”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共同以团队的方式，来将经济发展得更好。

目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挑战是从未见到过的，气候变化、贫穷以及等一系列问题都将各个国家在发展上遇到了很多问题，而且目前医疗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地增长。同时我们也是看到在未来有大量的机遇，我们在未来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地球以及一个蓬勃发展的世界经济，我们已经将成千上亿的人脱离了贫困，同时也给予各个人民成长以及发展的机遇。作为全球社区的一员，我们需要共同合作，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还是非政府

组织，还是苹果公司需要共同携手来改变世界。我们作为科技企业，我们相信科技能帮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好。作为一家企业，我们也认为我们有责任来解决目前人们和地球说面临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我们核心的本质，也对我们企业和我们的信仰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非常自豪，愿意为在中国的 200 万开发者提供工具，为他们提供移动的应用程序，来为整个成百上亿的市场提供更多的支持。

另外，我们也会不断地去增加培训的教育的领域投入，尤其是在经济困难的领域，我们认为教育是能够使世界更加平等的重要工具，这在中国也是不例外的。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目前的企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帮助来帮助其它公司实现绿色增长，帮助中国进一步地去应对气候变化。

企业是人类发展重要的进程，也是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与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关键的一点就是开放，开放需要我们对新观点开放，对新的解决方案开放。我们在过去几年当中也不断看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苹果其实也是非常感谢中国，感谢中国能够打开中国市场，将你们的社区对我们开放。我们也是期待中国在未来不断地进一步开放，我们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让中国以开放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潜力，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金融也是至关重要。到这一点，其实我也想到了一点，想到了我的英雄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已经厌倦了个人作战的命运，我们需要共同地努力。有些时候我们直接的努力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当目前世界彼此联动的时候，我们的整个人类也是彼此相连，我们的

未来是基于我们的合作。正如刚刚我们也听到过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每个人需要共同作战，需要以这种方式共同地努力，只要我们能够共同合作，我们的未来是没有限制的。

感谢各位！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以下为发言内容摘要：

李稻葵：全球化需要领导者，今天的世界谁来引领全球化，我想作为一个成功的全球化的引领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他自身的国内市场必须足够大，以至于能够市场跟其他国家协商，让其他国家加入开放，加入公平贸易。第二这个国家必须享有全球最领先的产业，这样他的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贸易条件，能够产生巨大的利润，用这个利润来补充其他的本国受害的行业。第三这个国家必须要有一定的国内的自我调节能力，

让那些反对全球化的本国的经济相关的利益者能够得到补偿，能够支持这个国家的全球化的领导力。

我们看一下历史，英国 1846 年开始，我的可能不够专业的说法是 1846 年开始一直到 1914 年一战爆发前的工业化，1846 年废除了英国古物法，放开了农业贸易。英国满足不满足其他三个条件，满足的，第一英国本身市场不是很大，但是英国有殖民地，你去反复看英国把殖民地和英国本土市场搁在一块儿讨论。第二英国技术当时领先，这点毫无疑问，英国当时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工业品。第三，英国人口 50 年之内从 56% 降到了 51%。当时的美国以及后来的德国没有完全加入这一轮的全球化，事实上美国做什么呢，这位大家可能不认得，他的名字塞木斯类特，他 22 岁的时候不顾英国人反对，英国当时反对年轻人步入美国，他当时不顾反对去美国复制出了一大批纺织机械，今年你能到英国大使博物馆看到它的纺织机械。当时他是偷学产生了美国内战之后的工业化。

德国伊斯特，他特别崇拜美国当时第一任之长。特朗普上台标志着这个时代结束了，1945 年到 2016 年。第二技术是领先的，毫无疑问高端制造、飞机发动机，飞机，还有电子科技，还有电子金融绝对领先。

第三国内调整能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相当不错，尤其是在落福斯经济之后能够得到补偿。而且前苏联和中国逐步加入了全球化，所以这一轮全球化应该几乎是完美的，所以我认为全球经济应该感谢美国领导了这一场全球工业化。美国整整花了 50 年时间才进入了角色。

好了，中国在全球化领导力做了什么呢，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学习，怎么学习？搞了大量的合资企业。这里面谈的是政府官员的学习，

我们政府官员不断到国外去学习，比如现在某一位副总理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过，前副总理李源潮也去哈佛大学学习过。第二件事儿，中国没有底特律，当时大众汽车的情况，大众汽车的 CEO 当时卡尔韩先生非常礼貌，造成这个竞争格局。

好了，美国是一个非常疲态尽显的领导者。第二技术相对下降，第三国内调整能力严重不足，因此出现了特朗普上台。疲乏了脾气很大，看不顺眼，跟所有国家对着干。中国是什么情况，中国有意愿有能力愿意改革，但是不被信任。习近平主席三次国际上重要讲话，达沃斯、博鳌论坛、进口博览会反复表态愿出力，愿意去“一带一路”，愿意扩大进口。但是他们把今天的中国看成当年的日本。今天的中国和日本当年完全不一样。

有什么前景，第一前景是单干，单边主义搞不下去，因为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日本，它的市场非常大。第二个前景是晾干 WTO，中国不可能重新加入 WTO，中国是自己的贸易伙伴，这个世界很可能是全球再一次大衰退，全球的生产贸易重新布局，这个结果非常可怕。

第三个可能是中国、美国、欧洲携手引领全球化，关键是开诚布公平的协商，不要把今天的中国看成当年的日本。在知识产权问题、市场开放问题、公平竞争方面、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争端解决方面都可以谈，要互相尊重互相平等的互相监督谈。

总结三句话，第一句话，全球领导力；第二句话，中美欧平等合作共同引领全球化是当前最好的前景；第三句话关键要彼此信任，平等协商，相互监督。谢谢各位。



瑞·达利欧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董事长

瑞·达利欧：非常荣幸出席今天早上的经济峰会，并见证中美关系。我第一次到中国是1984年，是中信集团邀请的。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中信集团也是作为一个窗口企业，通过这个企业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尤其是金融市场方面。来到中国以后，他们给了我10美元的计算机，中国领导人觉得这是一个奇迹，竟然有这样的东西。我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客观、历史的视角。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认为有四大力量驱动着发展。

这是事件不断重复发生的规律。在一段时间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由于生产率的提升，我们知道如何更高效的做事，让每个人每小时的产出更高，我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全球化以及大家的相互理解目的是能够找到生产率的提升。全球化开放事实上是非常好的方式，可以提高生产率。此外，债务周期、信贷周期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两种债务周期，一种

是短期周期，我们也把它称为商业周期。比如，进入衰退周期，央就注水，提升流动性，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央行再次紧缩，等于是给经济的发展踩刹车，这是几年的短周期，美国旧经历了这样的周期。此外，还有长期的债务周期。所以，信贷、钱、资金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在生产率的讨论和经济活动中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种影响，政治。政治家以及包括政治对经济活动、经济周期也会有影响。

这是从1900年开始到现在的数据图，跟现在的情况是类似的。1932年，当时有这样的债务周期，当时的特点是利率接近于0，央行通过大量的传统方式来激励和刺激市场，通过降低利率、印大量的钞票、购买金融市场的方式来提振市场。因为这样，市场开始往上走，尤其是货币市场。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这次的特别之处是利率已经降到了0。利率降到0就不可能再出现市场扩张，央行买了15万亿的金融资产，利率停留在0的水平。当然，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科技的发展。我们看到贫富差距的加大。

左边的图显示1920年美国顶层1%人口的收入与底层90%人口收入的比例。因为央行购买金融资产，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剧。不仅是受到科技的驱动，代替了人工，利润率上升，而利率又很低，这个时候是低利率环境，企业认为借钱回购股票很划算，这个时候，世界上充满了流动性。如果你可以无限制的借钱，你就可以拿到很多资金，这就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随着就业的改变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就会导致民粹主义的抬头。这是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指数，从1920年到现在。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现在的情况是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与此同时，我们又有巨大的贫富差距。当然，还有中

国的崛起。我们已经提到过中国的崛起，大家都非常了解。中国的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和增长，中国的人均收入上升了 24 倍，而中国的贫困率下降了 88%，人均寿命增加了 10 岁，婴儿死亡率下降了 85%。这是历史上少见的仅有的一次经济奇迹，这就是中国，所以中国现在就成为了美国的竞争对手。

我想做一个历史比较。我非常喜欢研究储备货币大国的兴衰，这些图给我们展示了 4 个储备货币大国，荷兰、英国、美国、中国。中国在几个指标方面都开始崛起，这也是兴衰的过程，它是同样的原因所驱动的。因为会有新技术出现，新技术能够提高经济产出、增加贸易，强化军事力量，建立金融中心，成为储备货币。这就是简单的归纳了一下，荷兰是发明了船，可以到全球航行。因为这个技术，荷兰的经济占到世界贸易的 1/2，给荷兰带来了财富和技术，而且打造了军事力量，因为需要军事力量来保护经济利益，这就是大国崛起和兴衰的过程，他们必须建立全球的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当时是全球的金融中心，后来是伦敦，然后是纽约，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金融开放也建立了中国以及全球的金融中心，它不仅能够带来繁荣，而且能够促进竞争。这幅图显示了把所有指数综合在一起，从 1500 年开始，展示了储备货币大国的兴衰。随着时间的推移，从 1500 年开始，中国原来是第一名，或者几乎是第一名。从 1800 年开始衰退，直到中国再次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以，我们要问的重要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是内部冲突还是外部冲突？是通过冲突的方式来经济还是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以取得共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开放会带来很多挑战，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

来应对呢？谢谢！



科鲁格 宝马集团董事长

科鲁格：谢谢余主任。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

谢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此次大会。今天能够有机会与各位在此交流，我感到十分荣幸。每次来到中国这个迷人的国家展现出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无时无刻不激励着我。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吃饭，用餐结束，在我拿出信用卡付账之前，一位中国同事已经用智能手机完成了付款，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与数字技术的完美结合。而这只是我一直喜欢来中国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创新步伐在过去 5 年中加速前行。我看到了中国在量子技术方面以及月球远端登陆卫星技术方面的领先。改革开放的 40 年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超过 7 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大约占到全球脱贫人

数的 70%。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贸易国和第二大商品消费大国。这一快速发展不仅重塑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也为本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许多跨国企业都从不断发展的中国市场中获益，宝马集团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对此深表感谢。中国的汽车行业发生了变化，中国专注于国内市场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如今，中国正在向世界开放。宝马集团也相信中国的战略愿景。

这次会议不光是回顾过去，同时还展望未来。中国拥有 14 亿居民，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同时也是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毫无疑问，它将在未来出行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出行领域，中国正在遵循明确的战略愿景。

首先，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电气化进程。中国市场极具竞争力。如果你的车在中国卖得好，在其他地方也会取得成功。展望未来，宝马集团不仅将在中国生产电动汽车，还将首次出口到其他市场。简言之，我们要在中国，为中国、为世界。

第二，中国客户在使用语音识别，在所有的汽车展上都能看到。自动驾驶新技术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沿，显然更喜欢拥抱数字世界。去年的调查表明 63% 的受访者认为自动驾驶汽车将提高道路的安全性。中国对技术的信任正在加快这些领域的步伐，数据安全将是确保车辆安全和保护客户数据的关键。宝马集团很自豪能与中国合作伙伴一起推行四级自动驾驶的测试工作，并已与中国主管部门进行了相关讨论。

第三，互联成为习惯。应运而生的人工智能需要大量数据。因此，标准制定者将塑造未来的经济。中国在这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我相信未

来几年中国将在智能城市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我们也希望为此贡献出我们的专业知识和资源。

第四，创新。中国正在从战略市场转向全球价值创造中心，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每 100 万人就有 1200 人投身研究工作。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这意味着中国具有巨大的潜力。2018 年，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跻身世界前 20 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每当我与中国朋友进行交谈，我们在沈阳工厂或者是政府的会面，他们的彬彬有礼、奉献精神、好奇心和深厚的专业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成为宝马集团在德国拥有最广泛的研发和生产基地的原因。

毋庸置疑，创新将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中国的经济进入新常态，挑战和机遇并存。我认为对于希望与中国共同成长的跨国公司而言，合作至关重要。展望未来，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成功将取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国的专业知识，并在全球创造和谐共赢。

第二未来的移动出行需要全球标准。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希望未来有安全的出行选择。为此，我们需要一个涉及政治、工业、权威机构的跨国的联合架构。我想库克先生也会同意我的说法。

第三也同样重要，我们需要稳定的贸易政策。我个人以及宝马相信只有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才能促进进步和经济繁荣。中国就是最好的例证。40 年前，中国踏上了征程，在全球经济常态化的当下，让我们拭目以待，中国的未来发展及在全球的未来表现。谢谢大家！

提问：中国今年对外开放的重点。

韩文秀：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制造业、服务业等采取更开放的措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外商投资法。加快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加强国际合作，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 WTO 改革，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今年任务很重，我们会大力推进，实现互利共赢。

提问：对世界经济怎么看。

库克：长期来看还是不错的，苹果不担心短期的发展，我们做的投资决策都是几十年的投资回报的考虑。短期会有挑战，但大多数问题是可以合作解决的。我对未来很乐观，全球各地的创新情况从未如此高涨。

达利欧：我们要看生产力、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政治，目前我们处在生产力非常有潜力的阶段，以及短期的债务周期。短期内，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来调解的空间比较小了，我们也看到了贫富差距。未来需要彼此合作帮助来解决内外部矛盾，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科鲁格：对于中国的经济和汽车行业我很乐观，在欧洲我们有很多不确定性，美国的话行业比较成熟，我们还是关注豪华车。

李稻葵：还是要警惕黑天鹅事件。

会场一：世界经济的危与机

主持：赵令欢（弘毅投资董事长）

发言：迈克尔·弗罗曼（美国前贸易代表；万事达卡副董事长）

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劳伦斯·芬克（贝莱德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马丁·沃尔夫（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

主持人(弘毅投资董事长 赵令欢)：2017年，两年前，也是在钓鱼台中国发展论坛，我在这儿主持了一场以拯救全球化为题的讨论。当时是逆全球化的思潮在抬头，经济下行压力比较明显，大家有许多担心。这两年来，从表现上看，逆全球化的思路、思潮越发激烈，各种局部甚至系统的割裂和冲突也似乎愈演愈烈，发展的不均衡，贫富分化，区域冲突这些矛盾凸显，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今天有机会请到了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研究思考和实践的一组领导人来跟我们共同探讨世界经济的危与机。我先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实际上他们每一位都不需要专门介绍，但是因为今天的话题是世界经济的危与机，组织者还是花了点心思，请了典型的代表来把这个话题在一个小时之内讲的深刻、生动、有用。

首先是迈克尔·弗罗曼，他担任过美国的贸易代表，也是以前讨论的PPP的中国的参与者之一，现在他是万事达卡的副主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先生，他对中国的经济是长期研究，他在中国供给侧改革方面多有建树。

我们还有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再次来到现场，来跟大家谈风险和投资在新的形势下的关系。

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先生来说中国的经济和宏观的发展。

最后特别切合主题，我们有马丁·沃尔夫，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和首席经济学家来给我们做理论和概括。

我们今天是分两段，第一段请他们每一位很简要的做一个开场白，然后我们希望能坐下来和在座的诸位互动邀请大家提问题，希望有精彩的回答。

现在我们有请迈克尔·弗罗曼他的开场白。



美国前贸易代表、万事达卡副董事长迈克尔·弗罗曼

迈克尔·弗罗曼：谢谢赵总，我谈论中美贸易谈论了很久了，我现在不好说这到底是危机还是机会。你打开任何一份报纸，打开电视或者看到网站上，都很难说不看到关于世界贸易的讨论，我们也感谢特朗普总统让贸易变得再次伟大。

到底是危机还是机遇的话，我想是如何看待连续性的问题。目前的美

国政府他们有很多长期的担忧，确实有很多国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在提升，当然还有一些产业的政策也会负面的影响到其他的国家，而且 WTO 现在也变成一个越来越难来推动多边贸易的谈判，这些谈判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这个话题经常跑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目前的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就是单边的对其他国家施加关税，包括一些新奇的对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些解释。而且美国还从很多的协议当中退出了，其他的国家似乎也愿意去满足美国的这些要求，也许我们可以说墨西哥可能本身不太愿意去赞同美国政府的这些对于以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修改，那中国现在也在和美国在探讨一些中国可能不太愿意面对的问题，中国现在已经被美国施加了两千亿美元的关税，当然中国希望和美国达成协议，即便意味着有可能会纵容美国的这些坏的行为，但是中美关系一直是与中国的接触从而使得更向美国为核心，我们现在是更加的向中国了，为中国改变了。中国在过去这些年一直是非常的遵守严明的纪律，而且能够从全球的体系当中获益，而尽可能少的来做妥协和做出让步。而美国优先的这种做法也是基于美国的一些自身的利益，那也希望尽少的付出代价，来改变全球的体系。最终实际上美国的对于世界贸易的做法越来越像中国了。那到底是危机还是机遇呢，现在还不好说。我们现在看到每一个国家都在整风相对的以邻为壑的去采取措施，到底我们有多大的压力，当时如果说遵循以规则为基础的方法的话，给世界造成多大的压力。那现在的程度上世界贸易的管理是需要调整的，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去解决争端，这就是市场的变化。

接下来就说目前中美之间的谈判，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想第一

步就是要决定到底这是危机还是机遇？我们都知道，谈判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买买买，也就是说中国要买多少大豆、买多少液化天然气等等，很多人都希望说中国光靠买买买就能够解决所有的贸易争端的问题。有的就说，这是一个中国很愿意去给特朗普总统的一个礼物。另外就是说双方要讨论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这些结构问题可能就更难谈判了，因为这就涉及到“中国制造 2025”这样的政策，但是应该说一些基础工作应该说已经做完了，在过去的几年，奥巴马政府的执政期间，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双方谈判协定，当时已经 95%都谈的差不多了，我们想接下来由希拉里担任总统来继续来谈。里面谈到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技术转让，以及对国营企业的补贴，还有对强制技术转让等等和强制的合资等等。

其实中国一直在内部性的调整，希望能够达成共识，来单程这种谈判的协议，所以其实大家都希望说中国目前的政府也希望继续延续着双边投资协议的这些谈判基础来继续谈，它有国家之间争端的解决，还有一种叫做双方的通过仲裁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中国是否愿意说美方征收关税，中国不采取报复的行动。我想下周谈判还会继续，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双方之间是否解决，以及是否达到一个拐点，是否是危机还是机遇。

主持人：谢谢迈克尔·弗罗曼，你的发言是作为一个发言，发言的非常好，总结了中美谈判之间所显示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局势的变化，我们使用多边和基于规则的方式而转向更多的双边的谈判。一些具体的形式会决定最终的结果以及不确定性，我想最终也许是一个机会，我们拭目以待吧。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大家上午好，我主要想讨论一下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些风险。去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的增速开始回调，大家对经济下行的风险担忧在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协调了今年和明年的预测，波罗的海经济预测来看，全球经济势头增长还在减弱。过去一个特点，全球同步复苏的态势开始逆转，不同经济体的分化在加剧，在发达经济体内部，美国虽然由于减税政策效应的减弱，强劲的增长势头在减弱，但是它的表现还是要比其他经济体都要好。欧元区经济开始出现很多问题，特别是德国，受外贸和汽车生产下降的影响，经济在明显的回调；日本也比较低迷，新兴市场在下降。全球贸易摩擦正在冲击全球经济，主要贸易摩擦还在升级，WTO 去年9月下调了今年的贸易的预测值，MF的估算，如果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话，对未来全球经济的生长的影响会达到0.8个百分点。

第二个风险，全球的债务水平居高，也在增大金融市场的风险。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估算，我们现在全球的负债差不多要接近 250 万亿美元，是 GDP 的 3 倍，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特别是 2008 年以来，我们的债务增加了差不多要 75 万亿，而全球的 GDP 只是增加了 24 万亿美元。尽管债务上升的势头在下降，特别是中国的负债水平在得到有效的控制，但全球的债务水平依然很高，高到对利率的变化极为敏感。在美元走强和国际金融市场利率走高的背景下，那些在超低利率时期大规模负债的新兴市场，将会面临巨大的本币贬值的压力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土耳其阿根廷前一段的金融动荡反映了这个态势。

第三个特点是全球经济协调难度增大，影响着全球复苏政策。当前国际经济形成博弈期，发达经济体谋求建立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新的国际轨辙和制度体系，但掌控力下降，难以完全有效的发挥主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WTO 正常的运行受到干扰，G20 机制也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所以彼此的协调面临困难。另外地缘政治的动荡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振荡也带来不确定性。影响全球经济的因素还不得不提到中美两国关系紧张，中美两国 GDP 占全球的 40%，两国的摩擦或者是博弈，特别是伴随着其中不确定性，在今后一个时期都将会是影响的重要因素，中美谈判取得进展，让世界充满了期待，但系统性经济担忧仍然让不确定性难以完全消弥，所以我们看到全球经济振荡是在焦虑中上升的。不可否认，2019 年全球依然会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只要各种风险不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应该不会出现全面的衰退，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全球的金融监管框架得以强化，金融体系稳定性提高，新兴市场外汇储备也比较充盈，为应对风险也创造了条

件。

从中长期看我觉得有三个因素对未来得走势会有很大的影响。第一就是新一轮技术革命能否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新一轮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正在迅猛发展，智能化的趋势在强化，数字产品贸易服务贸易占比提高，尽管信息革命技术也会带来革命性的摩擦，比如程序化工作对就业的冲击，但是它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会进一步深化各国分工和合作，全球经济融合的趋势会因为这种技术的发展而进一步强化。

第二个因素就是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能否达成共识，并发挥正面的效应。WTO 成立以来，全球贸易大概是 GDP 的增速 1.5 倍，但 WTO 也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应对非关措施不够有效，促进服务贸易有限，数字和知识产权监管能力不足，163 个成员国要达成一致，决策效率非常低下。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说，多边贸易相对于双边贸易来说，它依然更有效。

当前 WTO 改革正在启动，虽然主要经济体利益诉求差异很大，短期内很难达成共识，但是这种贸易摩擦和投资保护带来的巨大成本，会使人们终究认识到基于规则的贸易体制总是要比双边贸易体制更加有利于全球经济和自身的贸易。

第三个因素就是全球化能否适应这种变化，并且能够进一步升级，来形成新的全球经济秩序。

总之这三种力量会左右全球经济未来得走势，也将左右全球经济未来的次序，我们将牢牢把握机遇才能赢得全球经济更好的未来。谢谢。



贝莱德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

劳伦斯·芬克：大家早上好，谢谢。

金融市场正在处于一个转折点，金融市场事实上驱动了全球市场的成功，事实上全球市场的成功，最初源于柏林墙的倒下，之后随着全球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全球储蓄率上升，给我们带来这么一波经济增长。

通常来说，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尤其是 G20 的贸易中的国家，它们参与了全球的经济治理，尤其是像世贸组织的机构，他们认为如果进一步发展全球贸易，会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经济发展中来。这也是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基础。在 1990 年左右，就开始了这样一个进程。

如果回去看看 2008 年、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你会发现这一危机早期的迹象其实已经和 2015 年的发生的一些金融或者是经济市场的情况非常类似。可能也会这一轮的新的波动也给我们带来一些颠覆。它的根源在于

民粹主义的上升，以及政府试图努力应对这种民粹主义的方式。

关于贸易的谈论，是民粹主义抬头的结果。我们要更加关注这方面的发展。对资本市场来说，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应对民粹主义的崛起，民粹主义是因为什么原因崛起的。如何采取措施来缓解民粹主义上升或者抬头所带来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会面临一个越来越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世界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贸易问题，因为每一个国家都试图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关于贸易关税还是科技方面保护自己的利益。世界上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尤其是在欧洲看到保护自己的高科技企业的做法。

所以我想，这样的变化可能将是越来越有颠覆性的，对世界来说。这并不意味着结果一定是糟糕的。也许这一切可能会带来非常好的结果，如果正确合理应对它们的话。我们应该想一想各自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整个过程中，也就是应对不平等的过程中，我们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从金融危机之后，不平等越来越两极分化，主要是央行一直都非常有效帮助全球经济摆脱非常严重的衰退。但是它们所采取的工具是那些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改善金融资产状况的这样一些工具。因此拥有大量的金融资产的这些人，显然他们的财富得到大幅度增长，而对世界上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他们没有太多的金融资产。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大多数的欧洲人，可能自己家里有一套房子，对中国来说，可能有很多的储蓄。但是绝大多数的储蓄都存在银行，所以他们并没有从金融资产，大幅增值当中获益，尤其是和拥有大量的金融资产，比如说债券、其他的金融资产持有者那样获得如此多的收益。

所以，世界上的不平等，贫富差距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这是金融危机之后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民粹主义抬头的重要原因。

现在我们看到社交媒体得到广泛的应用，因为这个世界思考或者行为的时间周期更短了。对政府来说，要找到一个方式，在短期内很短的时间内来应对这些变化。通过工作来实现一个更好的结果。所以我想，我给很多企业家写过信，给他们提这样一个理念或者是目标，就是：目光要长远。我的确相信，全球的投资者，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尤其是取得成功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要关注那些有使命感的公司。当然，这些公司的所谓的使命并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说为他们主要的利益相关方是股东谋利。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股东、雇员、客户，更重要的是服务的社区，为这些来谋利益。那些在这些方面做的好的有使命感的公司，更好的通过雇员和客户的合作，成功找到他们长远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使他们和雇员、客户建立起非常良好的关系。意味着雇员更愿意工作，他们的客户更愿意合作，这样的企业更有可能实现长远的盈利。

那些与他们所服务的社区有很好关系的企业。比如说中国的企业要取得成功必须成为中国的企业，对墨西哥的企业要成功必须变成墨西哥的企业，对美国也是如此，也要成为美国公司，这是重要的因素。我真的认为，那些重大的变化，重大的改善会迫使我们的社会通过进一步加强全球合作来发展。我想，这将是未来的一个大的发展趋势。我认为，应当要求资本主义为更多人的利益来谋福利的，这将成为基础，也成为我们进一步对话和合作的平台。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这样的目标，这样的使命，真正的来讨论，以这个平台来进行这样长远使命的讨论的话，可能贸易摩擦

就会越来越少。如果资本的企业如果不能成为这方面领导者，可能恰恰是我们面临最大的风险。

我认为，有一些国家的政府，比如说左翼的政府，我觉得对它们来说，最大的威胁对于全球经济最大的威胁，恰恰是这些左翼政府的一些语境或者是表态。这样的立场或者是讨论，会削弱放缓全球经济和发展。所以，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信，资本主义必须要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发展，来促进更好包容性。因为资本主义是让全球最具主导地位的企业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取得成功。

无论政府是否能够或者是试图帮助我们摆脱现在的困境，只要有良好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的企业来扮演领导角色，我们就能取得成功。政府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干预恰恰是给全球经济的稳定和成功，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这也会进一步威胁到全球未来的经济增长。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讨论世界经济的问题有一个话题绕不开，就是全球化的问题，我结合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观察。首先我们说全球化是事实，它的典型事实是贸易增长低于 GDP 的增长。

值得担忧的是，贸易增长如果速度再放慢的话，其中资本品的增长会更慢，而资本品的增长率、贸易增长率下降，会导致资本形成率下降，从而拖累经济增长，所以我们这个图非常清楚地显示出了贸易增长率低于 GDP 增长率的恶果。

我们转到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不是说什么要搞一些项目，不是说要有一大堆的产能过剩向外走，而是要推进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方略。首先我们看到“一带一路”要做的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都看到“一带一路”所串联的都是穷国呀，而我们注意到在过去全球化下这些穷国是被边缘化的，他们并没有在全球化体系中，或者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全球化体系的好处，“一带一路”让他们进入全球体系，享受全球化的好处，真正各个国家都会进入全球化的浪潮。

第二，和规则优先不同，发展优先。“一带一路”致力于推进参与国家的产能合作，因此推进各国实现工业化，满足最广大劳动大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帮助国内解决贫困问题，这是“一带一路”的几点，和所谓规则不太一样。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很多成功做法，比如说有些关于金融方面的做法、小企业的做法、一些特区的做法，都是能够直接借鉴的。

第三，“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如果说传统的全球化追求的是趋同，

他脑子里想大家都变成一样，都变成美国，那么“一带一路”说的不是这样，承认差别，承认多元，我们要做的是共建、共商、共享。我们提倡各国因地制宜根据本国情况寻求符合自己发展利益的具体路径和具体方法，而且我们致力于推动整个发展战略，和各国本国的发展战略对接，以求合作共赢。应当说这个“一带一路”提出了几年，到现在进入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我们可以说它的主要任务是机制化，也就是说要让“一带一路”成为全球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机制。具体来说，可能有这样几个内容，比如说进一步深化合作，比如说要与现有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对接的问题，包括和WTO和发达国家的全球化相对接。第三要利用“一带一路”这样一个机制，积极的参与全球治理。第四，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做好企业社会责任的跨国协调。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我们要规避搭便车的行为，要规避道德的风险。

当然我们在“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倡议下，要推动贸易便利化，刚刚美国首席代表说了，这次中美贸易剧烈冲突之前，两国之间曾经几乎要达成协议了，关于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现在我们还要继续做。另外要实现可投资的融资机制，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想这是在全球危机情况下发生的情况，我们相信“一带一路”会成为解救危机的有效方法，它会和整个世界相协调，来让这个时间度过危机，谢谢各位。



马丁·沃尔夫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我给大家探讨两个问题，每个问题下面又分成四个小议题。我先说危机，接下来再说机遇，然后每个下面又有小议题。

我非常感兴趣世界经济到底什么时候显示出来极大的不稳定性，我不想关注今年或者明年怎么样，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在 1900 年的时候，当时的全球是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世界，我们是什么时候经历了 GDP 增长的大幅的波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变得更加稳定，我认为这是因为经济管理做的非常好，还有就是货币政策的一些变化和革命。

第二个结论，我当然不想预测未来，可能会有气候的危机，现在有三个主要的原因导致了这个经济的波动。尽管说从二战以后，经济每年都在增长，但是这些不利的影 响是世界大战，这当然对经济是非常糟糕的，还有就是经济危机，比方说大萧条，还有亚洲的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

以及中东的战争影响到了石油的生产和供应，所以这三者要避免的话，应该说还是挺容易的。我们看一下从地缘角度，政治事件的发生，中美贸易之间的冲突，不光是贸易而言，是关于全利益，我的观点，美国他们现在觉醒了，他们得出了一些假设，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按照购买力平价达到美国一半的时候，也就是相当于葡萄牙的水平，那么可能再过几十年就变成中国的经济是美国欧洲加起来都没有中国经济那么庞大了。所以美国认为这种体制是不可持续的，贸易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还有其他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包括中东，中东实际上充满了各种各样不稳定的因素，比方说沙特，大家觉得沙特能否避免和伊朗的战争，还有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些冲突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全球的金融体系是第二个大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避免大的金融危机，我们刚刚经历了上一次金融危机，当时央行采取了大量的干预的措施，然后把这个利率降到最低，并扩表。

目前我们再看一下全球的状况，发达国家现在比危机前债务占 GDP 的比重更高，而且私营部门的债稍微的降了一些，但是政府的债务大大的扩张，如果说金融体系再经历危机的话，现在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所以我们需要像上次一样，在世界经济体之间开展合作。如果我们再一次经历金融危机，这个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小，这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就是去全球化，去全球化非常明显，而且未来会变得更糟，美国实际上相当于它要退出 WTO 了，它的意愿是非常清楚的，这些都是危机潜在的因素，如果大家不感到担忧的话，可能大家比我更加宽心。

另外如果说到机遇，实际上人类一直以来在历史上证明自己能够创造性的解决问题。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通常经济会增长，而且未来还会继续

增长，大部分是在亚洲，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民居住在亚洲，当然西方是占人口的 12%，但是西方的国家，我们需要解决很多的问题，而这就需要依据科技的日新月异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但是这就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开展全球的合作，并且避免一些错误。

最后我们需要做出一个选择，希望我们不要犯错，而保持全球的合作，否则全球就是灾难。

会场二：推动中美合作新共识

主持：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发言：朱光耀（财政部原副部长）

库尔特·坎贝尔（亚洲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前助理国务卿）

方星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谢淑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21 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前助理国务卿）

史蒂芬·罗奇（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

朱光耀：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我以紧密交融的中美经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利益为题做一个发言。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习近平主席对当前世界格局的客观概括和科学论断。积极的向上的力量，是推动这种大变局的动力。信息化的发展，使全球各国紧密交融。人工智能和量子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第四次产业革命呼之欲出。全球劳动生产率面临着空前提高的机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全球经济总规模 84 万亿美元的一半以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代表性，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不断得到提高。这是推动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新的动力。

与此同时，我们毋庸讳言，世界在一些国家中也出现了负面的变化，或者说是逆流。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经济全球化形成了重大的冲击。面临这种百年不遇的大变局，我们要抓住机遇，同时要应对挑

战。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当务之急是要跨越两个陷阱，也就是所谓的新兴的大国和守成的大国，必有一战的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和世界秩序、世界治理失去领导力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二者又是有着潜移默化的关系。

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2018年，美国的经济规模超过20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13.6万亿美元，无疑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60%。但是这不意味着中美两国要重蹈所谓的世界排名第一的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正在迅速发展的排名第二的国家必有一战的厄运。

中美两国是在共同的政治、经济秩序下运作，也就是第二次大战以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全球之中。就经济制度而言，它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中美两国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和关键的执行其规则的成员。就全球秩序而言，应该说是在二战以后，在美国的推动和领导来建立的。中国是这个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我们很遗憾看到，美国近年来在退出TPP，退出《巴黎协议》，也就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协议，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这种变化。

我们希望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有着更加密切的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服务于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正因为中美两国的关系这样重要，也因为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需要中美两国的共同贡献，我提四点建议：

第一，强化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确保中美关系沿着协调、合作、稳

定的轨道前进。中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是保证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的领导力。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两国元首的远见卓识，两国元首的政治共识，对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现有的多种沟通渠道下，保持多种的沟通方式，同时建议考虑建立两国元首的定期会晤机制。我想这是战略的保证，这是政治的引领，对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第二，要充分发挥中美两国现有的四个高层对话机制和中美两国现有的省州城市友好合作机制的作用。2017年4月，在海湖庄园，中美两国元首高瞻远瞩，建立了包括外交安全、全面经济对话、网络安全和人文交流四个高层对话机制。在当前形势下，我们推进这四个机制变得极为重要。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50个对话机制和277个城市对话友好机制，我们希望这些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第三，我们要充分发挥两国工商企业家的合作。2018年，中美贸易总额超过6300亿美元，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其中最大的贡献是中美两国企业家做成的，我们要珍惜一，要充分发挥两国企业家的作用。

最后，智库的作用和智库通过深入坦诚的交流，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对民众和媒体的引导。谢谢大家！



方星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方星海：我讲三点，中美关系如果说基辛格从1971年开始到中国算起的话，过去50年我们关系都是不错的，5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50年里，两国都已经成长出一大批对中美关系友好的人士。大家都希望两个国家关系好，甚至包括特朗普总统，他也不是说一定要跟中国作对的这么一个总统。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老是秀他的外孙女中文的技能。这么多人愿意中美关系好的人，这样的力量要用好。在座的大家都希望中美关系友好的，这股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个人认为中美关系确实是太重要了，这样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不能只有少数人去决定。大家都要介入，我相信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种非常强大的民间的力量，导致双方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友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今天这节的主题是要找到新的合作领域，刚才朱部长说了，

我们有很多政府间的对话，这都很好。但是还不够，我们应该让更多行业的对话能够开展起来。有时候一些问题在政府间谈非常难，比如技术竞争，政府之间谈，很难谈到合作的机会。但是如果搞技术的行业的专家，行业的这些人士坐在一起谈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找到很多中美之间互相合作的机会。中美这两个国家经济方面互补性非常强，互相可以有很多对对方有利的工作可以做。我本人是在主导一个中美金融圆桌会业界的一个对话，就是两国的金融人士坐在一起谈谈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加紧密的塑造一个中美之间的关系。我们上个礼拜刚刚在纽约开了第二次会，业界人士坐在一起大家有谈不完的主意，可以互相合作的主意非常多。这是我的体会，技术是这样，能源也是一样。中美两国从事能源的人士坐在一起，他们会找到非常多互相合作的机会。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以后，两国的关系各方面就会进一步友好起来。

刚才库尔特·坎贝尔先生谈到，美方对中美关系更多的是关注在竞争，怎么认识中国各方面的进步，比如中国技术这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有些美国朋友觉得中国这种进步好像不是很正规的进步，其实我觉得中国技术的进步，不管你有什么方面的理由或者指出很多其他方面美方认为不是很正规的做法，中国技术进步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的投入。这点，在座的做 PE、VC 的同行都可以认同。中国这些年技术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技术的进步是因为巨大的投入，而不是其他的原因。如果美国觉得中国技术进步这么快，有点羡慕或者有点嫉妒的话，我的观点就是美国你也多投入啊，预算要增加，技术投入预算要增加。与其说中国哪里做的不好，还不如自己多投入一些，美国在技术方面还可以投入的

更多一些。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史蒂芬·罗奇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史蒂芬·罗奇表示，中国通过高储蓄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而美国是另外一个极端，没有储蓄也实现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必须要输入外国的储蓄，资产负债会出现极大的逆差。美国跟很多国家都存在双边的贸易账户赤字，比如2018年美国跟102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贸易方面的赤字，中国是最大的赤字来源国，美国甚至跟梵蒂冈都有贸易赤字。而通过双边的加税是不可能实现减少赤字的。

史蒂芬·罗奇给出了4点建议。第一个就是急需有一个BIT，双边投资协定。让中国的跨国企业和美国的跨国企业能够更自由地进入对方市场。第二，美国需要储蓄更多，来解决双边多边的贸易逆差。中国也需要去减少储蓄，来更多的促进消费等等。第三，在网络空间需要有引领的作用去

维护秩序。最后，我们需要有更机制化的结构性的对话机制。双方都需要强化自己的体系，修复自己的体系，双方也需要去达成一些妥协。可以让度给对方重要的一些利益，通过妥协体现出更深刻的智慧，而不是硬对硬的愚蠢。

会场三：WTO 改革与全球化的未来

主持：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发言：帕斯卡尔·拉米（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

高燕（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宁高宁（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巴尔舍夫斯基（美国前贸易代表；美国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资深国际合伙人）

佩妮洛皮·蔻加诺·戈德堡（世界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帕斯卡尔·拉米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

大家早上好!

我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简单讲几点。

首先，多边贸易体系和 WTO 现在面临很多的困难，这种困难来自于内部，也来自于外部。内部是这些成员国，外部的威胁来自于特朗普先生，成员国自己也有责任，对于现在这样的情况，成员给也要负责任。WTO 的愿景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来促进全球贸易。在过去十年这个目标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实现，在全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制度上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和 20 年之前比起来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出现了一些障碍。我们看到 WTO 的这些规则的发展并没有按照我们预期的应该有的方向来发展，比如说像在补贴方面应该有更多的规则，但是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规则没有按照我们应该期待的那个方向制定出来。

第二个危险是来自于美国，世界贸易组织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攻击，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他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几乎每天都在讲。他有一个理论，说世贸组织对美国是没有好处的，他想对 WTO 进行改革，实际上他是想彻底的破坏世界贸易组织。这也要看你读他哪一篇推特上的推文了，他是不是能真正代表美国政府，最大的问题是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要看各种个不同的情景，我认为我们可能有两个可行的计划，计划 A 和计划 B。

计划 A 是要对 WTO 进行改革，我们假设美国想对 WTO 进行改革，想改善它，让它变得更好，让之前工作做的不太好的地方进一步改进。这是有道理的，确实 WTO 是应该进行一些改革，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需

要解决一些紧迫的问题，比如说补贴要加强规则的制定，在争端解决机制上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之前美国拒绝了要指定一名审判人员，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欧盟、日本的观点多多少少是一样的，另外还由美国和中国，可以说这形成了一个三角。欧盟和日本在推动着美国，也推动着中国，实际上现在这个游戏变得非常简单了，计划 A 还是把美国放在中间，让中国更多的参与进来，更多的发挥一个中心的作用，我不知道这个计划是不是能行得通，这是欧盟和日本想做的事情。

计划 B 是如果特朗普总统彻底破坏掉了 WTO 的话，我们可能要想一个没有美国的 WTO 是什么样的。当然，这不是我喜欢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 A 计划行不通，必须得有一个 B 计划。

对于中国来说，是否保留在 WTO 当中，对中国来说没有什么备选项的。未来我们要让贸易保持开放和自由，很多问题是多边贸易当中的很多问题，不可能通过双边的贸易安排来解决，多边贸易机制非常重要，双边的贸易机制重要性变得越来越弱了，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的多边贸易背景之下，比如说像补贴，或者是关税，对消费者的保护等，这些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具有多边性质的。现在我们有这样的紧张的情绪，就是说短期我们会有一些紧迫的问题，长期来看我们要对 WTO 进行改革或者对以多边化的制度的多边贸易机制进行改革。



高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 经济峰会，就世贸组织改革和全球化的未来这个主题进行讨论。首先，要代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这次论坛举办表示祝贺。大家都知道，过去 40 年间，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通道，成为促进各国合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全球市场规模、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国际分工的深化恰好和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性相遇，这些年来中国主动融入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从鼓励出口到进出口并重，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从加入世贸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和世界的融合日益加深，在实现自身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在对外开放中

展现出了大国的担当。放眼全球，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数百年来，通过战争、殖民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争夺利益的国际格局，正在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利益关系的方式演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一整套国际贸易、金融、发展合作的制度安排，曾经营造了稳定的国际环境，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时宜、势宜，这个体系显现出了代表性和包容性不够，未能适应国际经济力量新变化和世界格局的新调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碎片化，机制封闭化凸显，现在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着自 1994 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最大的一轮重构。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基石，世贸组织成员的贸易额已经占了全球贸易额的 98% 以上，当然世界贸易组织的某些现行规则也确有不完善之处，没有反映出 21 世纪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动向。

中国是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地实践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支持对世贸组织与时俱进的加以改革和完善，世贸组织的规则虽然不够完善，但不能另起炉灶，不能推倒重来，不能改变贸易自由化的大方向，不能改变开放、透明、包容和非歧视的基本原则，不能搞排他性和小圈子，要坚持平等参与，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照顾大多数成员的关切，尽可能的寻求最大公约数。

女士们、先生们，三月的北京正是“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我们在尽享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时节，也时不时感受到料峭春寒的袭扰。经济全球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既深入发展，又面临挑战

可以说是在曲折中前行，发展不均、结构失衡、治理困境、南北差距、数字鸿沟和公平赤字问题日渐凸显，共享不足、包容不强、开放不够和创新不足也倍受诟病。逆全球化的表现林林总总，有一些海外媒体甚至认为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世界进入了慢全球化。中国人云，“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综合研判人类历史和世界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仍将是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现在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平台期，其速度可能放缓，动力或将转换。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水平更高，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经济全球化也正在孕育。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是一片蓝海，蕴藏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经历曲折前进和螺旋上升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必将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加可持续。让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人群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历史的大势必然浩荡前行。

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的波折，我们要以创新的思维共赢的理念、合作的方式密切的协调，共解时代命题，共担历史重任。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支持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建设者，我们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与各方一道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使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高质量的方向发展，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

在经济全球化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需要各国政府、工商界、行业组织携手并进，良性互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一直身处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一直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行动派，我们将当好中外

企业经贸交往的桥梁纽带，积极为决策者提出更多的明智的建议，在国际规则制定中贡献更多智慧，发出更响亮的声音。最后，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各位！



宁高宁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家早上好！

在这个会议之前，今天上午我和拉米先生聊了几句，我问他，现在在WTO来有多少人？他说，大概还有七、八百人吧。人还挺多的，他们还在做什么？他们还在正常的工作，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听到WTO的一些声音了。他说，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在中国我们确实没有听到WTO太多的声音，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拉米先生和巴尔舍夫斯基女士，他们其实都是WTO的老兵了，他们十年或者20年以前就和WTO打交道。今天我们非常幸运的请到了他们两位跟我们共同回忆一下WTO过去的日子。

现在中国人非常的困惑，因为突然之间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过去觉得 WTO 应该是贸易争端的最终的解决地，因为原来包括美国和其他的国家让中国加入 WTO，中国人民当时也是花了很大的勇气才加入 WTO 的，那个时候在中国也有很多的争议，比如说我们要保护我们国家的工业，我们需要克服帝国主义的壁垒，当时有很多的争议。现在我们看到情况不一样了，我还在大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学的就是比较优势这个东西，来自于西方的这些经济学家，我记得一个英国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比较优势的理论，我们当时都在学这些东西，比较优势、自由贸易、WTO、自由经济，这是我们当时学的东西。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是如何庆祝中国加入 WTO 的那个时刻，基本上每一个级别的政府官员都必须要去学校接受培训，去学习 WTO 的规则，即使现在很多的大学，他们甚至有一个 WTO 的专业，WTO 已经成为了一个学科，现在有很多 WTO 的研究机构，现在在中国还是存在的。当然，中国因为 WTO 从中获益了，全世界也从中获益了，全世界都享受了十年、二十年的黄金发展期。

中国过去成为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全世界也从中获益了很多，因为中国有低成本的商品、低成本的劳动力，全世界都从中获益了，并且全世界也从中国的市场当中获益了。所以在中国的很多投资，全世界也从中获益了。现在有很多的公司 CEO，甚至我认识的很多 CEO，有些人现在也在场。比如像来自于加拿大的人寿公司，他们之前也是和中化有合作，他们成为了在中国增长规模非常大的保险公司，他们从中获益了，我们现在是非常困惑的。WTO 现在好像停滞了，我们现在甚至不知道未来 WTO 是否还会存在，是非还会像过去一样正常的运转。这七、八百人他们在做什么？

现在争端解决机制好像已经不太管用了，美国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在阻止 WTO 正常的运转，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有些人在说 WTO 会不会彻底解体，或者是替换掉 WTO，或者是怎么样。全世界还在正常的往前走，但是 WTO 好像停滞了。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WTO 的改革，或者是改变。关于争端解决机制这个问题能解决吗？比如说涉及到跨境的电子商务的这些技术性的问题是否能够解决，这是我们之后要做的事情。现在首先我们要在几个事情上达成共识，因为这几个事情首先能够决定 WTO 是否还能够存活下去。

一是我们是否还深信自由贸易、全球贸易？

二是我们是否需要贸易全球化？因为这个东西最开始是由美国提出来的，并不是由中国人提出来的。中国人深信这个东西，并且跟随，马上在贸易政策当中由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三是一个国家是不是应该得到公平的待遇？

四是我们是否应该把贸易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五是贸易政策和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是否应该有关联？

六是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状态这个事情和一个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有没有必然联系？

七是贸易政策和国内的大选有没有关系？你可不可以用贸易政策去赢得你的大选？

很多人其实知道，这种贸易政策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它可以成为一个大选的工具。

谢谢各位！



巴尔舍夫斯基 美国前贸易代表；美国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资深国际合伙人

大家早上好！

讲一讲 WTO 和全球化，因为这两个事情是密切相关的。OECD 最近报告说全球的 GDP 增长已经开始放缓了，确实全世界都是这样的，现在 G20 发达经济体和 G20 新兴经济体都在放缓，实际的 GDP 增长已经下修了，在 2018 年、2019 年就下修了，2020 年基本上也会走平，可能会微涨或者是微跌，不同国家情况不太一样。全球企业的预期都是非常负面的，贸易增长在减速，跨境贸易、投资、银行贷款、供应链都在缩水，或者是基本上停滞不前，如果和全世界 GDP 相比的话。当然，这些趋势你可以说出很多的理由，随着全球化越来越脆弱，全世界大多数的人都在反对全球化，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很少有人经历过经济大萧条或者是世界大战，所

以他们并不理解当时分崩离析的状况到底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痛苦。

第二，对于在全球化当中的一些失败者，我们没有对他们做足够的事情，也就是说造成了事业这种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发达国家大多数都认为全球化可能会创造出赢家或者输家，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是输家，所以现在大家担心，1990年和2010年不同的年代的全球化已经不仅仅是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了，在西方也是一样。实际上这些看法我想还有另外五点可以作为补充。

首先，用经济竞争和冲突。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确实有非常深刻的经济冲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防战略、中国的政策文件都将这一点提出来了，美国说中国有一些系统性的公平的贸易政策，特朗普提出了单边的关税，中国认为美国作欺负中国，控制它的崛起，经济上的仇恨在全世界都在蔓延，比如说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其实在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看法，这种经济情绪实际上是由美国的特朗普总统提起的，这种情绪已经非常深重了。中美所产生的这种影响并不对称，深刻影响了全球的经济体系，非常威胁。

第二，现在缺失的领导力和失灵的领导力。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比二战以后任何其他政府走得更远，实际上他在对全球化和对全球化的体制，比如向WTO表达出从未有过的敌意，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在推特上写的一些东西，但是在美国确实他赢了一些政治认同，鉴于此美国过去是全球化的体制深刻的推动者，现在美国反对这些东西，中国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现在很多国家的保护主义在不断地崛起。所以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展现出应有的领导力。

第三，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 25 个发达经济体当中我们有 5.5 亿的人口，看到了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他们的收入或者是停滞不前，甚至比十年之前还下降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企业有成千上百亿的美元现金，生产力增长的速度放缓了，人口老龄化，有很多人都觉得现在的生活水平不及上一代人的生活水平了，这是美国二战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就很多的悲观情绪、疏远、愤怒，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有了很多民粹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

第四，我们也看到大家都会指责全球化，包括像 WTO 这样的国际组织，他们认为有可能是因为包括 WTO 在内的国际组织造成了这样的不平等的情况。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用国家安全这个事儿应对全球化，无论是贸易、投资、农业、食品、社交、媒体等等，以及一些技术。包括在美国、欧洲都会用国家安全这个理由来限制投资，其实中国也是如此，都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来对贸易和投资设置一些障碍。美国关于铝产品、钢铁制品增加了关税，很快也会涉及到汽车和汽车产品，这些都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对全球贸易或者是全球化设置一些障碍。这样使得在公众当中对于全球化以及国际组织产生了一些憎恨的情绪。

第五，我们看到现在商业形势发生了快速的变化。现在作为一些国际组织他们没有能够做出适应的调整，来适应新的变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新的国际组织，包括亚投行。WTO 自己也需要与时俱进，我们看到新的全球经济已经展现出来了很多新的特征，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等，在过去的 18 年当年，WTO 的成员国没有能够成功的进一步释放传统的经济体当中的新的活力。作为 WTO 以及其他的国际组织没有能够适

时的调整，我们看到有很多区域贸易协议，这在地理安排上是有便利性的，是按照地缘政治的趋势划分的，这种区域性的贸易安排可能会对全球贸易产生进一步的分化。我们不知道未来 WTO 是不是能够认可区域化的贸易安排？我们必须面临当今的现实，如果不解决现实的这些问题的话，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那些处于劣势的人口，收入下降的人口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现在商业的模式、消费的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不调整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实现在全球化、一体化的体系下应该实现的那种繁荣。这是我们未来应该走的一个方向。谢谢大家！



佩妮洛皮·蔻加诺·戈德堡 世界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

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代表世界银行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WTO 的改革以及全球化的未来是怎么样的。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对全球化有很多

的逆全球化的情绪，不仅仅是在美国，包括其他很多的发达经济体都是如此，具体的表现，每个国家不一样，在美国有贸易方面的紧张情绪，在欧洲大家更关注的是移民的问题。这种逆全球化的情绪表现在各个国家不一样，但是相同的一点是大家都在发出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告诉政策，这个信息是说全球化现在跑得太快了，我们需要停下来等一等，来调整一下。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需要问为什么到了现在这样一种情况？是具体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府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吗？我觉得，有两方面的答案。

第一，全球化的好处并没有在所有人当中得到公平的分享，有一些国家认为他们被全球化给甩在了后面，在有一些国家内部也有一些人，比如说他们因为全球化丧失了很多东西，失去了工作，但却是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我们也看到有跟多进一步阻止全球化的趋势，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普通人大多数还是支持全球化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普通的老百姓大家都认为自由贸易和投资对这个国家是有好处的，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即使在美国，普通的美国人他们也认为自由贸易对经济是有好处的。（皮欧德）（音）调研也显示出来，自由贸易对工人是不是来了好处，答案是否定的，尤其是制造业的工人的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自由贸易来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各种各样的学者也在讲，自由贸易或者是全球化有什么样的好处，（瑞卡多）（音）模型一直讲，我们看到生产要素当中有一个我们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是出现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解决？我们确实要把冲突的分配问题彻底的解决，这轮我们讨论的是 WTO 改革，我们的问题是 WTO 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应该解决什么样的问

题。它是做贸易治理的，目标不是为失败者做补偿，现在劳动分工并不一定是按照自由贸易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建立开放的贸易体系，WTO 并不是为失败的人作出补偿，这件事国内的政府来做。所以，对未来的建议是，不仅仅是对 WTO 而言，而是对那些支持自由贸易的人来说，我们要确保自由贸易应该有一定的补充。我们必须看到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结果，必须要让它实现平衡。

第二，现在为什么大家对全球化有这样的憎恨情绪呢？第二个原因是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大家都认为贸易是不平衡的，WTO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不是说现在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多欧洲国家也有这样的情绪，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大家非常关注的是 WTO 在过去建立起来的这些规则，它执行的过程中，尤其是争端解决机制他们有很多的抱怨，非常冗长的程序，官僚体制，通常要解决一个贸易争端的话通常要花三年的时间。如果是技术性非常强的案子的话，可能都不止三年。

此外，有观点认为 WTO 所制定的规则太狭隘了，没有能够解决现代经济所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一些比较重要的行业，农业、服务业、电子商务、跨境数据的流动，这些问题 WTO 规则都没有能够覆盖。

总的来说，一个国家内部的政策可能对贸易有很多的意义，但是 WTO 的规则却没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WTO 不仅仅是贸易过程是消除贸易障碍，我们需要恰当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个国家的监管进行合作，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这也是有道德的。如果一个要实行保护主义，我们也要意识到各个国家有各自的目标和优先发展的目的。有的时候，涉及到保护公民

的隐私权的问题，我们要确保有一定的规则和标准。有各种各样的考虑，都要解决这些问题，有时候我们会被这样一些考虑绑架。我们可以看到，未来 WTO 的改革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希望各种各样的程序变得更加灵活。我们不一定要求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能够完全达到一致，我们希望 WTO 能够变得更加灵活，未来在这个方向一定能取得更多的进展，另外在监管方面要取得一致性，这里面确实有很多的困难。

总结一下：关于未来，要想取得进展，要想推动新的多边的倡议，我们需要所有国家的参与，美国、中国、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要保证所有的利益和关切，至少都能够被大家所听到。当然，现在和过去已经不一样了，过去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在 WTO 谈判当中发言，要不然是内部自己谈判，要不然是让发展中国家去加入他们，为他们而发言。现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需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现在不仅仅在国际贸易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全球经济当中也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应该在未来的多边倡议当中发挥领导力的作用。

最后，说一些比较乐观的话。我们经常说黎明前总是最黑暗的，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目前的贸易冲突，可能也是一个全新的多边倡议崛起的黎明前的黑暗。现在的贸易冲突就像 80 年代美日的关系一样，每当有大国崛起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冲突，但是在 80、90 年代之后贸易体系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了，现在也比那个时候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现在已经比 1990 年、2000 年的时候好很多了，我认为 WTO 未来仍然将会发挥它的作用，中国也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谢谢各位！

会场五：巩固结构性改革成果

主持：戴小京（财讯传媒集团总裁）

发言：

杨伟民（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办原副主任）

肯尼斯·罗格夫（哈佛大学教授）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舒印彪（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劲（雪松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

杨伟民：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发言的题目跟刚才小京说的有一点差别，我讲讲未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讲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版，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今年2月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又提出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觉得这两次讲话如果归纳起来的话，其实前边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讲的和在政治局会上讲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脉相承之处，如果把这两个相关讲话归结起来的话，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升级版。

中国是在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年来应该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去产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去杠杆，现在宏观杠杆率我看有的数据反映也已经下降了，特别是促进了2016年从第四季度开始，一直到2017年经济的企稳，但略有回升。

但是到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再度掉头向下，这可能就会有疑问，说是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灵了？我觉得恰恰相反，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三去一降一补”是非常重要的，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的，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一些变化。

目前的经济下行固然有国内外短期因素的影响，我觉得主要还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在短期的反映。比如说经济减速主要是工业减速，因为我们服务业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原因工业减速的原因就是工业还没有完成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调整，我们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工业结构还是比较僵化的。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提提质增效，提质增效增加的GDP还不能够弥补产品减产而减少的GDP。新产品增产我们这几年新产品增加也很多，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等等，新产品增产、增加的GDP还不足以弥补老产品减产

而减少的 GDP，这是我们增长的一个现实。

2017 年，我们国家统计局统计的 89 种工业产品当中，有 55 种，也就是 60% 的产品的产量比过去 10 年间的历史峰值出现了负增长，在 107 种出口产品当中，有 74 种，也就是说接近 70% 比过去 10 年的峰值出现了负增长，我觉得这是工业减速的主要原因。因为工业你就靠两个，一个就是产量增加 GDP 增加了，再一个你质量提高了、GDP 提高了价格增加了。

刚才是从工业生产来讲，从去年情况来看，经济减速主要由于消费和投资双减速，消费的减速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特别是服务消费比重在提高。汽车的消费其中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汽车的消费进入到一个阶段性的周期性的变化过程当中等等。但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高房价及房贷的挤压。问题在于房地产，但是房地产本身也是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有些地方过剩了，有些地方供给又不足。

投资减速主要是地方政府投资为主的基建投资在减速，这是大头，我们投资当中基建投资，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主的基建投资占的比重很大。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过去前期积累的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过大，从去年开始中央开始问责，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不敢再变换花样举债搞基建了。其实这是一个更复杂的体制性的结构性问题，我们还是没有更多地触及，涉及到国企和民企，涉及到中央财政和地方事权，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等重大结构性改革。所以，我们还是要像总书记所要求那样，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我觉得这就升级了。

第一，要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提了八字方针，叫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这八字方针的提出，意味着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只是说要巩固成果。更重要的要拓展到增强微观实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是针对国民经济重大问题所提出的。

具体的任务，或者说举措，包括但不限于要加快僵尸企业出清，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减税降费，这个已经开始做了。当然结构性去杠杆是去年就开始做了，建立房地产的长效机制，因城施策，一城一策，按竞争中立原则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去年在这块加大了改革力度，在世行排名大幅度提高。要破坏垄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要加强新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过去我们的基础设施主要是“铁公鸡”，下一步要加快新经济的基础设施。另外在开放方面要扩大规则等制度性开放，这个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提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这是第一要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

第二，要以改革为手段，过去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成效，行政性手段冲在了前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两个字是“改革”，所以必须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走深、走实，防止改革空转，企业无感，你推了很多改革企业没有感觉。

具体加快国资、国企垄断行业，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政府职能等改革，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发挥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决定性作用。

第三，我想重点说一下，要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其中金融最为关键，因为金融是血脉，近年来银行贷款比重出现了“两降三升”，两降是制造业和民营企业贷款大幅度下降，房地产、金融业、个人住房贷款比重幅度上升，贷款结构中国是间接融资

为主，贷款的结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经济结构的僵化。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调整三个结构。一是市场结构，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我国实体经济每年背负 7 万亿的利息，这对金融业是增加值是高利润，对实体经济就是极大的负担，所以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一方面要减税、减费，同时也必须减轻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所以必须加快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才能够提高。

第二银行结构，要建设多结构广覆盖的有差异的银行体系，中国是国有大银行占绝对优势，银行之间业务非常趋同，不能够很好地适应实体经济当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占比高，科创型企业增长快这样一个特点，特别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如何适应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主体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我们如何从制度上搭建平等地服务三大市场主体的银行体系，这是下一步需要深入思考并深化改革的重大课题。要增强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业务比重，增加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进城商行、农商行业务回归，推动农业所有制重大改革。

三是产品结构，要积极推行个性化、定制化、差异化产品，要扩大抵押物的范围，按照企业不同产品的生命周期来确定贷款的期限，而不是反过来让企业来适应银行的贷款期限，要完善银行内的尽职免责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开发实体企业和银行共担风险的金融产品，开发适合民营、小微企业的产品等等。

以上供大家参考，谢谢！



肯尼斯·罗格夫 哈佛大学教授

肯尼斯·罗格夫：非常感谢主持人，我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可以参加 2019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而且之前也已经提到了第一位发言人的演讲。

在我进行演讲之前，我还是想要跟大家来说，在过去 40 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真的是举世瞩目，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能够看到这样的 40 年都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在过去 100 年，这 40 年对于全球经济的趋势，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利息比较低，而且通胀也低，这种情况是绝对绝对非常重要，而且中国的富强也已经看到了，基于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的稳定，其实我自己也没有觉得说任何的数字都像它看上去那么地稳定，但是真的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真的是表现非常好。

1899 年、1990 年的时候美国真的是金融危机，像过山车一样的情况，我认为在奇迹之后，我们也需要能看到一个比较低的增长速度的调整，我觉得这样的调低增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当然，也是一个挑战。

从人口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了，经济增速很高，但是劳动力减少，因此我们也看到，中国也已经有了很多的投资，但是我仍然要说到不能够仅仅通过不断地投资来进行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个事实，当然房地产市场也是一个挑战性的市场。我们看到其实中国整个在技术、科技上面已经占到了前沿，如果把所有的这些因素都考虑到，在未来 20 年如果 GDP 的增速在中国可以到 3%、4%，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而且我也觉得中国是能够实现这样的增速的。但是，如果说还要维持 6%，甚至是 8% 的 GDP 增速在未来 10 年、20 年，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难以想象了，不仅仅是现在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这是应该做的，而且我们应当能够去看到 4%，或者 4.5% 的 GDP 增速也是能够实现的。但如果说我们整个把需求的这些政策去不理性地考虑到 6%，或者 6.5% 的 GDP 增速，那实际上就会有很大一个影响。那么我们不希望看到中国的 GDP，或者是中国的经济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调整。我们希望中国的经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着陆，而且希望中国的经济可以越走越远，中国的领导者非常有魄力，绝对是历史上值得称颂的一笔。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现在除了调整 GDP 增速以外，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一些问题，也要去应对，我们之前不是也已经听到高杠杆率，其实高杠杆率并不是一个灾难，但是你要很好地去应对高杠杆率，要不然的话，它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而且我们看到可能有很多银行的贷款，有可能它会变成坏账。

我们之前说到中国经济，我希望是软着陆，但是我们可能会看到有可能 GDP 的增长，它绝对是会放缓的，同样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挑战，不仅是

要有更好的社会保障，以及有更好的国内需求、国内消费，以及科技发展，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想法。当然，还有社会发展的不平等，这些问题都已经得到了重视，中国的财政状况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看到中央政府的债务不到 GDP 的 4%，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外汇的储备也非常好。

当然，我们要看到地方政府的债务状况并不是那么良好，我们也看到每个人都在说是不是到时候要更专注地去应对这些地方债务的一些问题，不可能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因此，我们一定要进行调整，我之前已经说到了，比如说房地产市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在听到这样的一些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中国其实你去比一下中国，还有西欧。当然，我也理解，中国的房地产质量肯定还是需要跟国外相比的话，还是需要加强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一些评估的指标，这个已经占了经济的 25%到 30%，即使没有任何的金融危机，那么有这么多人都在房地产市场来参与就业的话，那么我也认为这对于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另外，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一直都是在说合作共赢，中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先不要去考虑全世界，先不要去考虑特朗普总统，如果说中国经济 6%，4%吧，西方国家 2%的 GDP 增长，你不可能一直想他们进行出口，因为你看一下这个数字这就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除此以外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的一些改变，在西方可能有一些是跟政治家有关系，有一些时候他可能想要去进行竞争，或者比对等等，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再去详细说。

但总之呢，中国不可能一直继续对西方国家的出口，中国的改革、中

国致力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这都是好的努力方向。

我还没说到环境呢，很显然环境又是另一大需要攻坚的课题，而且也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难题呢？结构性改革其实说实话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话题。因为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如果是刺激机制的话，你就给出很多钱，可能局面就会变好，但是结构性改革我们必须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其实台上坐着的嘉宾都非常清楚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几年我们看到结构性改革一直在被提到，但是结构性改革的速度和步伐都是比较缓慢的，我也知道结构性改革有多复杂、多艰难，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相当于要把资源从国营的一些企业这里调到私营部门，你还需要很多的一些政策，要有国企的改革等等，或者是让所有的经济参与者都能够适应比较低的 GDP 增长，所有的这些因素都需要我们注意。绝对不是说我们的经济奇迹还能再持续 5 年、10 年，你不能跟人们这么说，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非常开放地跟人们沟通，不能去假装好像奇迹还在持续，不能够再掩饰、掩盖所有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中国的领导者是极具智慧、极具耐心的，可以有能力和耐心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而我也认为结构性改革所有的这些我们也听到了相关的一系列讨论，我知道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我们绝对需要巨大的决心和耐心才能够实现结构性改革取得成功。

谢谢！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在巩固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下，我想提醒大家提出关注 2019 年中国财政政策的配置格局，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面对新的经济下行的压力，今年的财政政策提出要积极财政政策中要加以体现，围绕财政赤字、减税降费、政府投资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现在讲到 2019 年财政政策配置格局的时候，我想有两条大家会发现，而且应当发现，一条就是今年的财政政策的配置格局和以往的配置格局，特别是和 10 年前我们经历的财政政策的配置格局有所不同。

第二，今年财政政策的配置格局和此前经济学界所讨论的、所预期的，甚至强烈主张的财政政策的财政配置格局也有所不同。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其一是赤字的安排，今年的财政赤字总额是 2.76 万亿，增量是 3800 亿，赤字率是 2.8%，对于这样的一个财政赤字的配置格局，大家不妨和 10 年做比较。我们会发现财政赤字的扩张力有多大，不取决于总规模，而只取决于增量，就 3800 而言。应该说和我们所论

及的新的经济下行压力本身是不那么相匹配的，也和大家曾经论及的要增加财政赤字的规模和力度也是不那么匹配的，那为什么？所以我们不能不深思，因此在看到财政赤字安排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既要看到我们为了应对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而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的赤字率，扩大了 3800 亿的财政赤字。但同时也要看到另外一条，就是为什么财政赤字率的提升仅限于 0.2 个百分点？为什么不超过 3%？为什么离 3%还有 0.2 个百分点的用空间保留在那里？这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考虑到这一条，就能理解、想到结构性改革的成果，想到结构性改革对当前财政赤字配置的深刻影响，这是一条。两方面都要谈。

第二条，减税降费，我们的减税降费无疑是历史上力度最大，是空前的，但是当看到高达 2 万亿元的减税降费规模的时候，至少有三个方面和以往不同，和大家预期的不同要特别关注到。

比如第一，2 万亿的减税降费落在谁的身上了？主要是落在企业身上的，整个 2 万亿减税降费的设计的着眼点是落实于给企业减税降费，为什么要主要落实于企业身上？我想这和减税降费的出发点，以及它的归宿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是把减税降费的目标或主要目标锁定于给企业降成本，或给实体经济降成本。当然对于个人，应当说从去年 1 月 1 日开始启动的个人所得税的综合制的改革，已经兼顾了给个人扩需求、给家庭扩需求的目标，但是当把扩需求的目标和降成本的目标放在一起做评判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政策目标是向降成本一方倾斜的。因为综合制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是减税，但减的主要是低收入阶层，或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虽然几千万人不交个人所得税了，但是从个人所得税最终规模上减的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在一部分人减税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人是要加税的，所以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你会看到它的着力点在哪儿。

第二，当看到高达 2 万亿减税降费规模的时候，你注意到它的归宿点，或准确讲说得更清楚一点，减税之后那个留下的收入亏空不是靠增列赤字、增发国债去弥补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落在哪儿了？落在削减政府支出规模上了，推出了四条削减政府支出规模的措施。其一是政府要减少一般性支出 5%，其二进一步减少三公经费 3%，其三是对于长期闲置的资金一律收回，其四是让一部分国企和央企增加上缴利润的比重。

大家注意到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之后的记者会上已经说，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措施，一共筹集了 1 万亿元人民币。换言之，看到这次的减税降费主要是以削减政府支出规模作为支撑的，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扩大赤字，即便扩大了 3800 亿，这 3800 亿和 2 万亿的减税降费的规模相比，它绝对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是和以往有很大不同的，也和大家的预期有所不同的。

第三，你注意到这 2 万亿的减税降费的规模，是落在哪儿呢？是落在增值税和社保缴费上的，抛开社保缴费有特殊意义，我们暂且不论及，为什么都落在增值税身上，而没有落在，或没有像以往那样落在企业所得税身上，即便给企业减，我们可以在企业所缴纳的税费上作文章，企业既有流转税费也有所得税税费，传统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企业所得税距离企业的需求最近，而且最少的实质效应，为什么落在那上面去呢？我们着力给企业降的是成本，而不是扩的企业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整个的中国税收制度改革，也是要落在结构性改革上的，这种结构性改革就是我们要减少、压缩流转税或者间接税占整

个税收收入的比重，要增加直接税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这两条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也能看到结构性改革在减税降费上的影响或影子。

还有其实很多其他方面的例子，比如说基建投资，今年也是扩大的，扩大基建投资的同时，强调要和补短板结合在一起，要瞄准于那些有特定目标的短板项目。如此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安排告诉我们什么呢？此积极财政政策非彼积极财政政策，把它扩展到周期调节上我们也必须说此逆周期调节，不同于以往我们所经历的逆周期调节。

因此，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对于2019年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包括逆周期财政的安排，包括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在内的所有举措都应该换一个背景来定位，那就是高质量发展。换一种角度来理解，那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舒印彪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舒印彪：我谈一下再电气化，用再电气化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助力推动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大家上午好！

能源转型发展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能源发展，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能源安全新战略，成为我国能源转型发展的顶层设计和长期战略，为新时期能源转型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电力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截止到2018年底，全国发电装机近19亿千瓦，研发的量近7万亿千瓦，均是世界第一。其中非化石能源的发电装机达到40%，电量达到30%。新能源发电、燃煤发电、核电、智能电网、特高压输电等高端技术也达到了世界领先或先进水平，实现了中国创造和中国引领。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进能源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围绕贯彻能源安全新战略，推进能源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电力在能源转型中的中心地位，加快再电气化进程，助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谈谈看法。

在能源消费的环节，要推动电能对化石能源的深度替代，提高电在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这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重要方向。电作为清洁高效电力的终端能源载体，是效率最高的能源利用方式，终端利用效率在90%以上。

据测算，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我国单位GDP能耗就可下降3个百分点。2018年中国国内单位产值能耗下降了3.1%，同时单位产值电耗增长1.8%，电力消费弹性系数近年来首次超过1，达到1.29，标志着我国再电气化正逐步跑出加速度。

在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能源绿色转型变革趋势愈发明显的今天，推进电能替代，提高电能在终端能源中的占比，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一致行动，对于提高用能效率，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生态环境，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预测，到 2050 年，电力在全球中的能源消费的比重将从现在的 20%提高到 45%。电力在我国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将增长至 47%。

在能源生产环节，要推动清洁高效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加快发展绿色低碳能源，这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重要路径。提高能源清洁利用水平，要坚持把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转型发展的主力军。

近十年来，全球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年均增长分别达到 20%和 45%，我国增速分别在 45%和 170%左右，远高于同期化石能源的装机增速。到 2018 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了 7 亿千瓦，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都是世界第一。

预计到 2050 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将突破 36 亿千瓦，占全部电力装机的 70%以上，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将分别达到 7 亿、13 亿和 12.5 亿千瓦。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结构决定了今后一段时期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仍是能源转型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80%煤电机组达到了要求，供电煤耗保持世界领先，同时国家更不断加大散煤治理力度，把更多的煤转化为电，提高煤炭的清洁化利用水平。

中国华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电力工业的一面旗帜，目前公司发电装机达到 1.78 亿千瓦，占全国发电量的 10%，华能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

一要务，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坚持绿色转型作为重中之重，2018年公司低碳清洁能源的投资占全部公司电力投资的78%，低碳清洁能源装机达到了5858万千瓦，煤炭清洁水平保持行业领先，公司94%的煤电机组达到了限值要求，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14个百分点。2018年完成供电煤耗比全国水平低每千瓦时9克。下一步华能将不断加快绿色转型升级步伐，坚持东西部开发相结合，在北线地区以特高压送出为布局，风、光、煤电输送一体化大型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在东线主要围绕东部沿海地区，着力打造有质量、有效益、基地型、规模化、投资、建设、运维一体化的海上风电发展带。

此外，我们将在投资建设风电、水电基础设施方面，积极发电水电，有序发展供热产业，拓展国际化发展空间，开拓能源服务市场等方面发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在电气化进程，助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要在四个方面予以加强：

一是加强科技创新，积极推动能源电力技术变革，聚焦解决卡脖子问题，在系统安全、新能源发电技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以及先进储能、职能电网技术等前沿领域加大基础前沿投入和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深化传统技术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融合，在用户侧参与电力系统平衡调节，保持系统安全高效运行。

二是加强平台建设，特高压是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实现清洁替代及电能替代的重要载体和基础平台，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18项特高压工厂，跨区、跨厂输电能力达到2.1亿千瓦，为实现能源资源的集约开发，进一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在全国范围加大能源电力的互联互通，构建起

统一配置、多能互补、灵活高效的能源互联网。

三是加强统一开放的市场建设，围绕夯实能源安全基础，加快能源统一规划，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统一、公平、开放的电力市场。

四是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扩大能源电力领域开放水平，在项目、投资、设备制造、技术创新等方面深化国际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充分利用 IEC 国际权威标准组织的平台，推动各国电力标准互联互通，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华能愿与各方一道，为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而不懈努力，为创造美好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谢谢大家！

3月24日 开幕式



李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伟：尊敬的韩正副总理，尊敬的新加坡尚达曼副总理，尊敬的本届论坛的外方主席蔡澈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非常高兴在这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春天，与各位再次相聚钓鱼台国宾馆。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参加本届论坛的各位嘉宾和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去年，中国隆重庆祝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有力地宣示了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十二世纪的中国思想家朱熹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问渠哪得清如水，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跨入新时代、坚持扩大开放，就是要开新渠、引活水，就是要通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格局。这是中国持续保持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大幅度提升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世界的转变增色添彩。中国和世界都从这种开放性、合作性的关系中受益：国际环境总体保持和平稳定，全球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社会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市场更为广阔，科技创新更加活跃。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过去四十年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使如此众多人口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这是属于全人类的伟大成就。

但是，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格局、全球经贸环境、产业转移、风险特征等都

在发生深刻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在抬头，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变中有危，变中有机，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今天在这里共聚一堂，正是为了携手应对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这届论坛的目的和价值所在，就是要在不确定中，寻觅积极的确定性；在分歧中，寻觅共识；在疑惑中，增进信任；在忧虑中，增强信心。

在不确定的阴霾中，我们应该看到积极的确定性：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改变；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正越加敞开；中国经济仍在稳步发展，市场不断扩大，新的比较优势方兴未艾，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在座的诸位可以相信中国仍然是国内外企业的发展热土。

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扩大开放、寻求合作的信念、决心和诚意没有改变，与会代表们寻求沟通、理解、合作的热情没有改变。稍后韩正副总理将发表主旨演讲，李克强总理明天将会见与会的主要外方代表，还有许多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领导人也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这都表达出中国政府与世界对话、沟通、合作的诚意。我很高兴地了解到，在这次论坛正式开幕前两天热身活动中，与会代表已经通过论坛秘书处安排了数百场的各类交流活动。有如此沟通的热情，合作的诚意，我相信我们必能度过寒冬，迎来春暖花开的盛景，收获不断深化合作的累累硕果。

作为“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经济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到今年已经是第20届了。论坛坚持“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是中国政府领导、全球工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在过去二十年里，正是得益于各方的积极参与和贡献，将论坛打造成

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对话平台，在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与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岁，是中国文化的“弱冠之年”，即跨入成年人之年。对于论坛来说，同样意义非凡。在这重要里程纪年，我代表论坛主办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长期以来所有关心支持论坛发展的全球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9年，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本届论坛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是对我们面对的时代主题和共同期盼的呼应。我相信，通过与会各方坦诚交流，积极探讨，我们一定会增进相互的信任，取得更多共识，找到更多合作共赢的机会。

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蔡澈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集团全球总裁

蔡澈：尊敬的韩正副总理，李伟主任，各位部长，各位代表，各位嘉宾。

作为 2019 年中国高层发展论坛的外方主席，我非常荣幸在此欢迎各位，并代表外方的与会人士致辞。

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今年则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 20 届年会，不管是改革开放的成功，还是发展论坛的成功，都代表了中国几十年转型的成功。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坚持扩大开放 促进合作共赢”，这既是中国过往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通往未来成功的路线图。包括戴姆勒在内的很多公司都参与、见证、贡献并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从戴姆勒的角度来讲，汽车行业是这个成功案例非常重要的缩影。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的汽车市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对于包括戴姆勒在内的许多国际制造企业来说，它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单一市场。同时，就我个人经验而言，中国也超出了我们所有人最早的预期。十年前，戴姆勒跟北汽集团的合资企业北京奔驰预计规划产能只有 3 万台。但是，北京奔驰现在已经迅速发展成我们全球最大生产基地，现在年产量是最初规划产量的 16 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戴姆勒德国以外最大的研发中心设在北京的原因。

中国成为非常巨大的卡车市场，仅去年一年就售出了 120 多万辆卡车。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运输技术、物流体系越来越先进和发达。我们坚信对于出行行业的各个企业而言，中国不仅仅是个市场，也是未来发展的风

向标。中国人口的体量、消费模式、创新精神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经过近几十年的追赶式的增长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了尖端创新的时代。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发展也是提供了很好的教材，展示出开放与合作才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真正的动力。

最近有一些声音在质疑全球化时代是否即将终结。对此，我想说：“我不同意”。当然，时代充满挑战，复杂动荡的国际环境、经济下行的压力正在动摇全球商界人士的信心。但是，我觉得可以用一句中国的成语来回应，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应当更坚定不移继续推动自贸和开放市场。中国在这方面发挥着举轻若重的作用。

毫无疑问，中国如何去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应对外部挑战，这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全球化的进程。我们高度赞赏中国高层领导对于推动全球化进程做出的承诺。正如习主席在许多重要场合表示的那样，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对我们这些国际与会人士而言，中国将以更加包容的姿态，进一步推动开放的承诺来鼓舞大家。我很感激也很自豪。因为在中国发展论坛 20 周年之际能跟大家再次相聚，在当下分裂主义、民族主义盛行之际，发展论坛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也就是全球合作才有未来。在过去的 20 年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已经名副其实成为中国最具声望高层领导与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中外学者之间沟通的平台，我们肩负共同的责任、共同的目标，只有众志成城才能不负所望。

韩正副总理，我们很荣幸您能拨冗莅临本届论坛。李主任、卢秘书长，

非常感谢你们主办这次活动，搭建平台。衷心祝贺论坛已经取得的成绩。

在座很多外方的同仁在过去 10 年、20 年坚持不懈的在参与论坛，我想我下面要说的话可以代表很多国际同事的心声。中国是我们过去的一部分，在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未来决定我们成败的关键。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跟大家来贡献我们的建议、分享我们的经验、交换我们的观点，我让一起努力，确保中国未来 40 年比过去 40 年更加辉煌。最后，祝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第二单元 稳中求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主持：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发言：宁吉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宁吉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胜利闭幕不久，很高兴有机会与各位新老朋友相聚北京，共同展望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交流探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问题。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第20届高层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改革发展的国内外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刚才，韩正副总理发表了主旨演讲，对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作了深刻阐述，讲话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听了很受教益、深受启发。这里，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绩、思路和举措，我谈几点看法。

大家知道，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问题既有总量性的也有结构性的，既有需求侧的也有供给侧的，但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经济循环不够顺畅。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坚定不移把这方面工作向前推进。过去一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围绕“破立降”这三个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出台实施一批重要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破”的方面，我们着力推进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过去一年进行了结构性去产能、系统性优产能，2016—2018年，累计压减粗钢产能1.5亿吨以上、退出煤炭落后产能8.1亿吨，均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还取缔“地条钢”产能1亿多吨，稳妥处置“僵尸企业”，重点行业

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去年工业产能利用率处在 76.5% 的较好水平。积极稳妥降杠杆，市场化债转股扩量提质，落实金额超过 6000 亿元，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总体稳中有降。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分类调控、因城施策，2018 年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 52414 万平方米，较 2015 年末下降 27.1%，今年 1—2 月又减少 162 万平方米，多数城市商品住宅可售面积去化周期回归合理区间。

在“立”的方面，我们全力推动创新转型，2018 年，全国研究与开发经费达到 196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6%，占 GDP 比重 2.18%；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分别增长 11.7%、8.9%，战略性新兴产业营业收入增长 14.6%。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公布的中国创新指数排名由 2017 年的第 22 位跃升至 2018 年的第 17 位。粮食产量达到 1.3 万亿斤，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工业增加值突破 30 万亿元，制造强国建设持续推进。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47 万亿元，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 60%。服务性消费以两位数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76%。投资补短板力度加大，2018 年生态环保、公共设施、农业投资分别增长 23.9%、21.8%、16.4%，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16.1% 和 11.1%。

在“降”的方面，我们大力实施减税降费降负，降成本额度持续加大，去年又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约 1.3 万亿元，包括降低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率，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降低、停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清理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大力推动降低用能、物流等成本，全国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 10% 以上，企业获得感不断增强。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政府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决策

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改善供给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治本之策，必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加快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内生驱动、服务业和工业制造业共同驱动、居民消费和有效投资协同驱动的方式转变。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中国政府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了明确部署，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贯彻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上狠下功夫，重点做好以下4个方面工作。

第一，着力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持续加大破立降力度。着力破除无效低效供给。继续推进结构性去产能、系统性优产能，健全各方面责任共担和损失分担机制，稳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推动依法处置“僵尸企业”，制定退出实施办法。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与企业兼并重组、产业整合有机结合，稳妥做好去产能职工分流安置工作。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着眼“放水养鱼”、激发市场活力，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落实好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继续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围绕输配电价改革、公用事业收费改革等，切实

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加大投资补短板力度。聚焦三大攻坚战等薄弱环节，在脱贫攻坚、生态环保、农业农村、水利、科技创新、棚户区改造、社会民生和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促进有效投资。依法合规采用 PPP 等多种方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入补短板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川藏铁路、沿江高铁等一批重大工程规划建设。

第二，着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动性积极性。弘扬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构建经常性规范化的政企沟通机制，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落到实处。稳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准入、监管、退出制度。扩大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范围。深入推进电力、油气、铁路领域改革，自然垄断行业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运网分开，将竞争性业务全面推向市场。全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持续推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建立健全清单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完善清单信息公开机制，推动“非禁即入”原则和政策普遍落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由 2017 年 78 位大幅跃升至 46 位，中国市场主体已达到 1.1 亿户。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再推动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可比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今年选择在部分省市全面推开营商环境评价试点，明年在全国推开。持续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开展产权保护领域政务失信专项治理行动，推动各地解决一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问题。

第三，着力提升产业链水平，大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研究谋划新一轮全面改革创新试验，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在关键领域布局建设若干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加强重大技术装备补短板，大力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积极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升级各类“双创”平台载体，强化创业投资对“双创”的支撑引领。促进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继续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我国工业制造业产值及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但传统产业仍占较大比重。今年将实施一批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重大工程，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切实引导和支持各类生产要素向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集聚，促进传统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升级。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放宽服务业准入，扩大有效供给、推进品质提升，促进服务市场环境改善和秩序规范，不断增强服务业创新力和竞争力。深入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还要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稳定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政策和项目，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中国经济更深更好地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

第四，着力畅通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落细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抓紧出台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进一步加强政策统筹，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形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大投资市场。要

适应包括 4 亿多中等收入者在内的 14 亿居民消费升级和分级态势，调整优化产品结构、服务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畅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投资循环。积极拓展消费新增长点。研究制定居民增收三年行动方案，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加强消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制定出台促进汽车、家电等热点产品消费的措施。加快旅游、文化、健康、体育、教育、育幼、养老、家政等服务业发展，释放服务消费新潜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综合施策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重大风险监测研判预警。坚持结构性去杠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输入性风险，避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将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加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近年来，我们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不断扩大高水平开放。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6 年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全方位提升了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也彰显了中国道路的巨大优越性。截至去年底，已累计同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 172 份合作文件。数字丝绸之路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新热点。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 1.3 万列，通达欧洲 15 个国家 49 个城市。雅万高铁全面开工，匈塞铁路、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建设扎实推进，瓜达尔港等重点港口

项目进展顺利。国际产能合作稳步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截至 2018 年末，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 5 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600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增加了税收。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三共”“五通”的原则，遵循市场导向和国际惯例，发挥企业主体和政府引导作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扩大与沿线国家密切合作。推动贸易优化升级，搭建更多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的贸易促进平台。中国已与 40 多个国家建立了双边产能与投资合作机制，与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十几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创新融资合作框架，提高金融合作水平，增强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硬”“软”互联互通水平。大力推进陆上经济走廊建设，提升中欧班列运行质量效益，有序推进比雷埃夫斯港、瓜达尔港等港口建设和经营，加快空中丝绸之路和信息网络设施建设。精心办好第二届高峰论坛。做好论坛顶层设计和组织工作，确保今年 4 月下旬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积极成果，进一步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吸引力和感召力。

近年来，我们以全面放宽市场准入为重点，致力于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适应新形势新特点的要求，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去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 1350 亿美元，依然是世界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我们发布 2018 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两个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大幅压减，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在全国推行外资企业设立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口办理”，积极推进在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政府采购、资质许可、标准制定等方面平等对待内外

资企业，外商投资环境持续优化，一批重大外资项目加快落地。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出台实施外商投资法，加快制定相关配套规定，保护外资。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开放，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清理取消负面清单以外领域针对外资设置的准入限制。制定《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并设立生产研发基地。健全外资项目服务机制，集中精力推动一批规模较大、示范性较强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外资项目尽快落地。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从今年以来最新的数据看，中国经济运行继续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剔除春节因素同比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进出口剔除春节因素2月份增长10.2%，居民消费价格平均上涨1.6%，城镇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总体稳定，国家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这些指标好于预期，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展望全年，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任务。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全球经济依然面临新动能不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经济增长有所放缓，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新的更大机遇和广阔的合作空间。我们衷心希望，也非常愿意，和国际国内各界朋友一道，精诚合作，携手共进，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造福于中国人民，也造福于世界人民。

最后祝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圆满成功！祝20岁的发展论坛充

分展现青春活力，办得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高兴，今天又有机会来到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我对这个论坛非常熟悉，我是老朋友了。我首先要回应瑞·达利欧所说的，目前不仅对国家有很重要的任务，对全球有两个：气候变化、不平等的扩大。我现在会关注中国，现在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怎么能够保持它的增长，它的收入的稳定以及就业的稳定？而同时又能够应对越来越大的差距问题。

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发展速度非常快，现在中国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必须应对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边缘性的问题。这可能要被看作是在之前会议上所讨论的一个方向，就是要进入高质量增长的阶段。

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GDP 的增长不一定能带来大多数公民收入的增长。刚才瑞·达利欧在他对美国的讨论当中，已经把这点展示得非常清楚。虽然我们的经济增长了，可是美国最低层的工资跟 60 年前差不多。所以你可以想象，GDP 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多数公民工资的增长，你想 60 年中工资都没有增长，肯定是有一些怒气的。

第二个观点，GDP 和收入当中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生活水平或生活水平的提高，GDP 并不是衡量经济和社会状态最好的指标。因为有太多其他的因素。而对于高质量增长来说，其他因素非常重要，像安定、安全、住房，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要想生活水平提高的话，必须要考虑所有这些方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的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对于收入的分配原则是怎样的？如果我们对于收入进行平均分配的话，再分配的压力就小了。所以这里，我们社会最核心、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我们会产生这样一种不平等差距。如我前面所说，中国在经济的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让 7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平等差距增大。

有人指出，中国在 35 年当中，所创造的这样一种不平等，等于美国 200 年创造的不平等，这是有人开玩笑这样说。当然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和美国基尼系数是可比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现象，贫困是衡量最底层人的指标，但如果你看到社会当中巨大的不平等的话，一定会给社会带来问题。美国有一位总统的候选人曾经说过，这不仅仅是社会问题，不平等实际上是对经济、对于政治，以及我们社会的本身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也导致在全世界看到民粹主义的抬头。现在要处理的问题是，报平

等导致的副作用，导致的不良影响是什么样的？我们怎样克服这样一种不良影响呢？

要应对收入差距和不平等，要加强经济的各个层面。但是在我的发言当中，最关注的一点是说，不平等它是有多层面和多个维度的。我们有很多针对性的工具，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应该有更加宏观的视角。首先是要看，我们对不平等收入差距的定义是什么样，然后再看怎么解决它。

刚才瑞·达利欧谈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其实是决定机会，平等或不平等这样的基本因素。如果说教育不平等的话，没有人敢说这个国家是有平等的机会的，包括美国也是这样。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也要更加关注教育的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现在所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推动教育。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教育来产生的这样一种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这里所做的很多研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在大学的教育的方面，其实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他在不断地提高质量，不仅在大学的层面，在高中层面也是如此。对于高中层面披萨的考试，上海的学生是全世界最好的，超过 OECD 国家的学生。对于美国来说，马萨诸塞州和上海相比，上海的教育是领先马萨诸塞州两年。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这两个地方不能代表平均水平，最好的和其他地方有很大差异，我们要缩小差距。

另外是中国户口制度，户口制度也是对中国教育平等的障碍，现在也在谈要减少中国户口的障碍。

第二个问题是健康、卫生。人们如果希望生活水平更高的话，他们希望有非常好的身体。这里有两个点要谈：

一是它对于劳动生产率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艾伦·科瑞格曾经做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说明，之所以在美国在有些工作上参与的量很小的话，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

二是美国私有化的体系，很明显说明，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所以中国得特别关注，就是美国这样一个模式它的缺点。另外，欧洲的模式，它其实体现了各种多样化的模式，它是更加平等的，而且成本更低廉。

环境方面是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这个问题更影响贫困人口，比如环境不好的时候，他们更多地暴露于脏的空气当中。那些富的人有一些办法，可是贫困的人没有办法。而研究者，比如美国的科瑞教授他所做的研究，就是环境危害会产生长期的副作用和负面影响。

当然，好的环境也和更大的因素相关，比如宜居城市等等，1949年只有1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现在跟1949年不一样，中国刚开始是一个农业国家，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国家。如何能够确保中国人民能够获得体面的生活呢？这中间就包括刚才讲的教育、工作的机会、环境、健康等等，当然还有住房、工作等等。这些都是在未来缩小差距和不平等需要注意的事项。

国际劳工组织有“所有人都有体面工作”的议程，这里提到需要有公共交通上下班，有流动的机会。比如去除户口的制度，另外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多的时间的灵活性。还有在工资方面的差距，工资差距需要缩小。同时，中国跟美国在有些方面是很类似的，在有些方面是有区别的。现在中国有一个不同的层面，就是中国有很多国有大企业。

我这里想说的一点就是，要去解决这样一个工资差距的问题，它对于

解决我们收入差距是很好的办法，要提高更多人的工资。另外要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

我下面再非常简单和快速地谈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工具，我们这里有一系列的工具，其中包括利用市场的力量，确保人们可以有更多的创业的机会。另外，在税收政策方面，如果你要去解决一些像教育、健康、环境等等问题，你需要有很好的税收的政策。

中国其实有很多机会，来在税收政策方面进行调整。比如像环境税、土地税、资本获得税等等。这里要说的重要一点，这都是一些工具，这些工具在中国运用得并不够。这样的话，本来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经济体，并减少不平等。

社保，社会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市场并不能够提供足够多的保障来抵御风险，而所有社会都需要有良好的社会保障。现在中国正在朝这方面努力，但中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监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强调监管的重要性。要想创造富裕，第一种是自己创造财富，第二种是剥削掠夺别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是走美国这种模式，美国有很多人是靠剥削、掠夺来获得富裕的。比方说，他们通过信息不对称来牟利。大家看特朗普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如果有市场监管，就会更包容、更好。

同时，政府会发挥作用，能提高市场中的收入，有较好的社会财富的转移。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的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美国比肩的程度，不平等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全面的项目。

这么点时间给大家作全面的介绍是很难的，但我希望我列举的政策

工具，能够让大家更好地考虑，来减少社会的不平等。因为社会的不平等是一直存在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来改善社会的保障、社会的分配。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问我一个问题：中国能不能创造出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并且来创造稳定的增长？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做到上述这些内容的话，中国会变得更好。谢谢！

下面进入提问环节。

提问：如何看待中国做出的努力，哪些是比较成功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降产能需要合理措施。调整产能的障碍在于人们不想丢掉工作，地方政府也不想减少收入来源。化解这个障碍，需要打通经济各个环节，更好建立地方政府的税收基础，增强社会的总需求。昨天我参加了一个分会，讲武汉的改革。武汉的代表讲了一系列改革配套，来让武汉成为一个具有创新活力的热土，这就是一个转型的信号，从老的工业基地向新型基地转型，这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提问：想问问宁主任，去产能是不是有点过了？过去调的产能现在有恢复的趋势吗？您怎么看？

宁吉喆：不仅要总量上去产能，还要结构上去产能。有些在全国来说供给总量还是很大的，但在地方上可能有些供应不上。要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对策。去年四季度以来，钢铁、煤炭行业价格上涨较快的情况有所缓解，这里有结构性对策的效果，也有全球供需关系的变化。你提的这个问题提醒我们注意，去产能确实要按照市场化的规律，考虑到供求动态平衡的状况，加大结构性调节的措施。

张军扩：刚刚两位的演讲和回答都非常精彩，宁主任介绍了下一步要

怎样进一步努力提升供给侧改革。斯蒂格利茨教授也给我们提出了很有针对性的意见，感谢他们。

第三单元 积极财政政策新举措

主持：张来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发言：刘昆（财政部部长）

迈克尔·斯宾塞（纽约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刘昆 财政部部长

以下为刘昆发言内容摘要：

刘昆：按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今年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负担近2万亿元，这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在减税降费里面有一个比例构成，我们今年是以减税为主体，大约占70%左右，其他是由社保降费，降低各种其他的政府性收费，还有一部分对企业的经营性收费等等。我们将落实好

各项政策，实打实、硬碰硬，通过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强企业获得感。

第一个重点是小微企业。小微企业这次的政策，我们扩大了原来小型微利企业的范围，现在基本上和有关部门确定的小型微型企业的范围是一致的。目前小微企业这一块是活力很强的，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帮助它们，一共 1798 万户企业，占有企业的比重是比较大的，占了全部纳税企业的总数 95%以上，里面 98%是民营企业。而且我们对小微企业的减税主要针对所得税，按应纳税所得额不同，分别采用了所得税的优惠税率。实际上从应纳税所得额发分，有一些没超过 100 万的，税负是 5%，这是比标准税率低了 20 个百分点。在应纳税 100 万-300 万的是税负是 10%，用具体的税法来说比较复杂，但是结果是这个结果。

提高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免税标准，采取了简明的方式，用简明易行好操作来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地方政府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了资源税、城乡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等，我们是最高可以降 50%，现在各地都按 50%公布了政策。

制造业前天晚上公布了增值税降低税率办法，公布之后，大家还是反响比较好的。增值税的降税，按中国政府要求，从今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这里面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把制造业等行业从现行 16%的税率降到 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现行 10%的税率降到 9%。我们原来还有 6%一档的税率不变，考虑到净项税会减少，采取了扣除的方式，让它们只减不增。

刚才迈克尔·斯宾塞教授谈到了财政措施也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我们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也考虑到，在再分配方面起一些好的作用。现

在从国民收入分配来看，从近几年的趋势，中国企业在收入分配上，企业这一块的比重在下降，所以我们要通过这种方式，让收到下降的制造业，包括建筑业等能受惠。

在降费方面，我们准备下一步在5月1日起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的缴费比例，从20%降到16%。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的。当然，这个还要等各地宣布它们的政策。

同时，还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的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提高文岗和社保补贴力度，通过这些举措切实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也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迈克尔·斯宾塞（纽约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发言内容摘要：

迈克尔·斯宾塞：我们看到有一些风险，我觉得是有问题的，需要来解决的。

第一，非债的一些义务。政府在养老金这一块的义务责任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美国在健康方面的义务，跟我们现有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相比，是一个庞大的需要支出的量。直观看这一块，确实有需要去支出的情况，但是政府没有做太多的事情，直接往前推。如果再仔细看的话，发现国家在这些非债的义务方面的期限是非常不一样的。意大利也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养老金体系是现付即收的系统；美国有后期劳动人口的支撑。我看到的情况是在很多的政治体系下，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去做这个问题的推进是很困难的。

当然，如果早点去部署，早点去再平衡的话肯定更好。但是我们一般都会等到危急的时候再动手，那个时候就没有太多的选择方案。你可能要降低福利水平，让人们失望。所以你等了太久的话，就会太晚，延误时机。我们也讲到，人口结构可以调一调，帮助解决这部分的问题。比如说引入移民，这不是财政政策的范畴，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想法，也是比较直白的应对措施。我想讲的第一点，从广义角度讲，债很高，非债的事权支出也非常强，很多领域都需要我们加大支出，这个方案不太多。

第二，关于投资或者投资不足的问题。我来清楚阐释一下，在中国这还不是一个问题。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希望投资更加有效，是要避免低回报的投资或者是价格低于债的投资，但是没有人会控告说中国的投资不足。但是因为有了财政政策的不同举措，投资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公共部门的投资，首先是能够使人民受益。第二，它是成功增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它和私营部门投资是互相的补充。这种有形无形的互补，私营部门的投资能使更多的人民受益。所以在这个领域，要促进增长和生产率，投资也是必须的。

还有一点一直让我非常困惑。我的印象是刚才刘部长所提到的，中国试图取得的平衡政策。实际上中国还是相当平衡的，因为中国有投资，因为私营部门的投资不足，流动性紧缺，所以需要政府的投资来补上，这一点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一部分的答案就是公共部门的投资，其实在其他的国家并没有使得人们真正理解它的好处。因为我去过很多的国家，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是债务。我们经历了相当长的低利率环境，这就促使全球都在加杠杆，当然不一定是在政府部门，有一些国家是政府在加杠杆。此外，我们不光生活在低利率的环境，而且也生活在一个低通胀、低增长的环境，所以债务的阴影使得这些国家更加脆弱。传统的去除债务方式是通过经济增长，但是因为现在经济增长的乏力，环境一旦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对债务的问题更加担忧。

菲利普斯曲线已经不存在了。在我关注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一个失业和工资上涨之间的联动关系。现在这个关系似乎已经不存在了。我想我们对这个问题还不够了解，这也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如果说菲利普斯曲线彻底消失，它会彻底改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规则。美国现在做的是顺周期的财政政策，现在我们的失业率在历史上是最低的时候，15年和20年，大家会觉得这种时候还来刺激经济，是很荒谬的。现在我们只有5%的失业率，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去如何操作这些政策，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

最后，审慎的财政政策。首先要取得平衡，其次要决定财政政策要有多积极、主动。我们要考虑到其对增长的影响。意大利政府认为，可以采

取更加进取的财政政策，因为这样才能够推动或者刺激经济增长。但是，这个问题和复杂性就在于（我现在很不好意思要批评一下意大利的政府），意大利没有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经济增长的政策。如果没有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国家主权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会越来越高。现在其已经是仅次于日本的水平。所以，我再次强调一下，中国或者印度，在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政策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做政府的公共投资是有道理的，但是，还是取决于增长策略对不对。

第四单元：金融业开放与金融稳定

主持人(王一鸣)：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经过上午节奏紧张的讨论后，现在我们进入到大会议程的第四单元，本单元的主题是：金融业开放与金融稳定。回顾过去一年，中国宣布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举措，放宽了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准入，推进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加快国内资本市场改革。中国金融业正在展开双隔臂，拥抱世界。从长远看，金融开放不仅有利于中国优化金融环境，开放成果惠及世界人民，开放金融不等于可能会产生的风险和扰动。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下一步金融业开放的重点领域是哪些。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如何提升金融监管能力，加强与金融行业的韧性，防控潜在的风险与挑战。我想这些问题都是今天在座的各位所关心问题。

这一单元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两位权威嘉宾对这一主题展开阐释：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先生；
美国前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先生。

首先，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易纲先生作演讲。



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谢谢主持人。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金融业开放的进程和展望。

2018年，金融领域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不断加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深化金融改革。

一是营造适应的货币环境，强化货币政策拟周期调控，保障流动性合

理充裕。

二是精准支持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通过三箭齐飞，银行贷款，民营企业发债，研究创设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方面加大政策力度。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三是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四是兼顾了经济的内外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国际收支更趋平衡。

五是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完善利率汇率市场化机制，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其中，今天我在这里花时间想讲的就是扩大金融业开放是金融领域一项重要的工作。

第一部分，中国金融业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金融服务业方面，大家知道，去年4月份，习近平主席在博鳌宣布金融业要加大开放的力度，落实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人民银行宣布了一个金融业开放的时间表，对11项措施给出了具体的时间。目前绝大部分措施已经落地，极少数尚未落地的措施法律修改程序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相关的申请受理工作已经开始，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取得进展。瑞士银行对瑞银证券的股比比例提高到51%。安联成为我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美国标普公司获得进入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美国运通公司在我国设立合资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的申请已经审查通过。

金融市场开放方面，中国按照国际标准，持续推动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对外开放，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完善相关制度安

排。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受到国际市场普遍肯定和认可。

去年6月，我国A股正式被纳入MSCI指数，9月，富时罗素宣布将A股纳入体系。2018年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的增量大约6000亿人民币，目前总量已经达到超过1.8万亿人民币。彭博公司确认将于今年4月将中国的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债券指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中国坚持市场化原则，不断完善市场化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为调节。中央银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对外汇市场的日常干预，人民币弹性不断增强，市场主体越来越适应浮动的人民币汇率。

第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势在必行。

金融业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格局重要组成部分，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的自主选择，这既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金融业本质上是竞争性服务业。金融业和金融市场有三大职能，第一是有效配置资源。我国的储蓄率高，一边是储蓄者，一边是用钱人。如何把巨大的金融储蓄有效转化成金融资产，配置在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种金融产品上，这是配置资产的重要内容。越来越多的全世界的央行、基金管理公司、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也要配备一部分资产在中国的市场。我们金融市场的任务是怎么样有序开放，使得外国和国内的投资者都能够更方便，更有效配置他们的资产，这是我说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第一个重要的功能。

二、管理风险。金融市场重要的职能管理风险。主要是通过价格发现

和提供各种各样的工具来进行风险管理。金融市场要有一个不断交易的市场，使得价格的发现，不断的进行准确的价格发现，进行准确的定价。而金融产品的定价传递的是金融配置信息。如果我们用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无风险利率的话，金融市场上金融产品，金融交易和定价就能够把各种风险议价定价清楚，准确传导信息，有效管理风险。同时，金融市场要提供各种各样的风险对冲工具，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使市场主体买得进、卖得出，实现有效的套期保值，当他们投到人民币市场以后，会发现衍生产品、对冲工具和其他的金融产品上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今年的重点是如何使我们的市场能够准确定价，能提供足够的对冲工具，使得各种各样的投资者有效对冲他们的风险，有效管理他们的风险，这是风险管理是第二个任务。

三、提供金融服务。主要是服务老百姓和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当然离不开高效的金融资产配置，和有效的风险管理。我上面说的这两条，但是我想主要强调一下专业的金融服务能降低交易成本和集约时间。我们金融服务提高的效率和的衡量可以用它为我们节约时间来做一个衡量。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 20 年以前要交水费、电费要跑好几个地方，可能要花半天的时间。10 年以前的情况，我交这些费用去一趟银行，在银行把这种费用都交了，大概要花一个小时。今天，我要再交这些费用，我通过互联网或者是通过手机移动支付，只花 5 分钟。所以，这些时间的节约，说明金融的有效服务的效率大大提高。这些时间的节约，跟我在餐馆里吃一顿饭，比自己做饭节约时间，和我出去买衣服，比自己做衣服节约了我的时间，在道理和性质上是一样的。所以金融本质是一个竞争性服务

业。

金融要做好以上三个主要的职能，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一方面金融业开放，通过引入各类金融机构，业务、产品，可以增加金融的有效供给。这样有利于统筹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更好满足经济差异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另外一方面，金融业开放，会促进制度规则的建立健全，完善金融制度的供给。在我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主动学习成熟经济体的制度建设经验，使我们的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金融市场建设、金融监管等方面进步得更快。

第三，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五点考虑。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开放不断加快，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仍然有很大提升的潜力和空间。针对当前对外开放的水平有待提高的局面，要做以下五点考虑。

一、坚持金融业开展。金融市场开放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相互配合，协调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要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金融机构给同等的待遇和同样的监管标准，要以更加透明，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同等对待内外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要进一步完善境外合格投资者的制度，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增强人民币弹性。更好发挥汇率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二、要全面实施转入前国民待遇的制度。推动落实中资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都可以进入负面清单意外的业务。

三、完善制度规则，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加快相关制度与国际接

轨，完善会计、税收，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同类的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

四、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优化行政审批，提高审批过程透明度和效率，加强政策制定沟通和协调，提高政策指定的透明度，做到规则简约透明。

五、完善金融监管。中外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比较持牌经营，接受监管。扩大市场准入，同时我们又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使得监管能力和开放程度相匹配。

第四，完善与金融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

金融业开放本身并不是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但是开放的过程可能提高金融风险防范复杂性，需要不断完善与开放相适应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

2018年以来，中国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取得重要的进展。

一是推动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加强了对金融领域相关事项的统筹研究和协调，金融委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由人民银行设立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负责日常的工作。人民银行的职能得到进一步加强，被赋予必要的统筹协调手段。监管资源配置更加优化。

二是我们稳定了宏观杠杆率。随着“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2018年末，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总水平为249.4%，比2017年末下降了1.5个百分点。未来随着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比重提高，一部分债券融资会转变为股权融资，有利于宏观杠杆率进一步稳定。

三是影子银行业进一步规范。出台了《资管新规》和配套细则，整治

金融市场乱象，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控制。

四是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强化对系统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完善了跨境资本流动，宏观监管，有效应对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

此外，我们还平稳有序处置了高风险的金融机构，整顿金融秩序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未来，要适应不断提高的金融业开放的水平，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统筹各领域的政策力度和节奏，形成政策合力。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的框架。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作用，保持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下，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进一步完善系统性金融机构监管，丰富政策工具箱。加强对金融市场实时的监测，阻断跨市场，跨区域，跨境的风险传染。

三是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实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和流量。

四是健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机构和处置的机制。探索以存款保险为平台，建立市场化法制化金融机构退出机制。

今年，我们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无论是完善金融服务，还是防范金融风险都要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指示精神，稳步推进金融业全面开放，助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体系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支持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

答问环节实录

问题 1: 美国目前在政治上对金融业开放存在争议, 中国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况?

易纲行长: 中国对金融业对外开放仍存在不同的声音, 有支持开放的声音, 也有人有所担忧。从我们的角度看, 过去中国开放的经验表明, 凡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 竞争力都变得更强, 提供的服务也更优质, 而未开放的领域效率相对要低一些。所以我认为金融业开放对中国是有利的, 对中国人民尤其有利, 这将允许内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竞争, 提供更好的服务, 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所以我们在权衡利弊后认为扩大开放利大于弊。同时, 我们在法律法规和监管上做好相应的准备, 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这些都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

问题 2: 感谢易纲行长介绍了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的进展, 令人振奋。有海外媒体议论, 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足, 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 一方面有利于控制万一出现的风险, 但另一方面可能导致货币政策不够灵活。请您分享自己的看法。

易纲行长: 1995 年中国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央银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以来, 中国的货币政策执行得比较稳健。从国内物价看, 物价水平保持稳定。从汇率看, 人民币是强势货币, 20 多年来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升值了大约 30%, 对美元升值了 20% 多。从资本流入流出和国际收支平衡看, 2007 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重大约在 10% 左右, 2018 年降至 0.3%, 国际收支大体平衡。

现行货币政策框架下，我们有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率等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有能力防控风险。我认为已经可以适应金融业对外扩大开放的需求。全世界不少投资者都希望配置一些人民币资产，适应这一需求需要我们提高投资的便利度，提高法律框架、监管政策、会计制度、税收制度上的透明度。金融机构、金融服务的开放也遵循同样的原理。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可以控制好风险，更适应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更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中国在贸易、投资、服务、旅游等领域已经融入全球，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业开放同样也要做到。

问题 3: 金融创新，比如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新型金融业务的全球性扩张，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您如何看待在这些领域与其它国家的监管协调？

易纲行长：第一，金融创新是好事，金融创新的一些技术使得成本降低，普惠金融得以推广，老百姓从中受益。第二，金融业务是牌照业务，特别是涉及到从社会公众融资时，应注意风险防范问题，牌照业务必须要强调保护公众利益，保护中小存款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三，金融创新使得各国监管当局的协调非常重要，因为存在很多金融创新，其资金流、业务和资产管理都是跨境的，这使得各国监管当局的协调变得更重要。我们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讨论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跨境进行有效的清算，并且公平地保护各国债权人的利益。

第五单元：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主持人(隆国强)：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我们现在进入第五单元的讨论，主题是：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这一节有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民先生；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刘遵义先生。

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经过进入深度调整的时期，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此同时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上午韩正副总经理特别讲了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大对外开放的举措，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对外开放也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中国提出，构造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开放的重点是什么？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新机遇。这都是我们与会者关心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两位专家将先发表演讲，然后再进行讨论。

首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钱克民部长演讲。



钱克明 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民：尊敬的隆国强副主任、刘遵义教授，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走过 20 年的年头，本届发展论坛将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作为主题，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每一届论坛都离不开开放这个关键词。尽管各个阶段讨论开放的背景、语境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是开放可以说是发展论坛经久不衰的话题。这也反映了社会的共识，也就是中国的发展与开放存在着内在的密不可分的关联性。

去年，中国是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所以中国的发展模式，开放的内涵，包括开放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

讨论，正像国强主任说的，我们深入探讨中国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

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性开放转变。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性开放。今天我想围绕制度性开放这个主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主要谈三方面内容。

一是制度开放的内涵。它与过去的开放相比到底有哪些不一样。

二是为什么现阶段要强调制度性开放。

三是如何更好地推进制度性开放。

一、制度性开放的内涵。

结合中国开放40年，从“四个更加”来把握制度性开放的内涵。

一是制度性开放是更加深入的开放。过去我们更多关注促进商品要素流动性开放，推动开放的主要措施是降低边界准入门槛。今后的开放要向边界后延伸，更加注重国内规则、制度、法律层面的完善，强化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让开放在消除边界壁垒，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制度性开放是更加全面的开放。过去我们在一些领域，一些区域开放的步伐更快一些，但也存在一些开放不平衡和不协调的问题。未来要更加注重扩大服务业开放，西部开放，注重推动形成一二三产业协同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三是制度性开放是更加系统的开放。过去我们的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的开放要注重顶层设计，要以新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从新时代开放理念，开放的战略，开放的布局，开放的动力等各方面来系统谋划。

四是制度性开放是更加公平的开放。过去我们的开放在一些方面实行政策洼地，主要的目的是集聚资源和要素，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当然也带来一些竞争扭曲，包括寻租行为等等弊端。未来我们要更加注重竞争中性，规则公平，对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是我个人对制度性开放的内涵的一些初步的认识。

二、现阶段为什么推动有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制度性开放转变。

首先，这是顺应中国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过去我们主要是依靠充裕的劳动力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依靠廉价要素来支撑经济规模扩张。现在我们的要素禀赋条件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必须要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变，向改革要红利，向制度要激励，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的制度环境，推动发展模式转型升级，提高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们一个主要的目的。

其次，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新发展趋势的需要。有许多国际上的著名智库研究报告表明，上世纪下半叶到本世纪头十年，各国通过关税等壁垒，加上通讯包括交通成本的降低。推动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的黄金时代。但是，现在研究发展，进一步推动消除边际壁垒，消减边际收益越来越小。当前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前沿领域，也由边际措施转向边际后措施，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制度性开放是为了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新要求，通过对标最新的国际规则营造一个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环境。

第三，这是参与全球治理变革大势的需要。当前大家知道，国际经济

正面临着百年不遇的不变局。国际经济治理领域也面临重重困难，一些重要的多边机构，比如说 WTO 的改革步履维艰。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制度性开放，就是要以更加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推动包括世贸组织在内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为消除过去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也带来的一些发展侧枝(音)，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提出中国方案，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三、如何在实践当中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性开放。

近年来，中国着眼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举措。商务部具体干了很多落实的措施，我们下一步将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打造制度开放的新高地。十八大以来，按中央的部署，先后设立了自贸实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努力打造高水平的开放新平台，在建设自贸实验区方面，我们赋予更大改革的自主权，发挥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这些在建的自贸实验区，主要是聚焦商事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开放创新制度，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努力建立一个同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迄今为止，已经在全国负责推广了 153 项制度创新成果。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方面。大家知道自由贸易港是国际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央的部署，分步骤、分阶段探索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和制度体系。目前，大概按照中央的部署，确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未来发展方向是突出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海南定位，并且学习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方式和管理方法。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方面，大家知道，大湾区是一国两治三个关税区。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特别是发挥香港澳门开放平台和示范作用。支持珠三角九市，加快建立与国际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规则。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大湾区全面开放发展。

二是全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近期，《外商投资法》已经经过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法律确立了新兴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大家知道，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是国际通行的对外资进行管理的制度，大多数区域性贸易和投资协定以及双边的投资协定，都是采用负面清单形式来进行外资准入管理。我国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也是对接了国际通行准则，在清单之外的领域，一律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进行管理，不再专门针对外商投资准入进行限制。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任何一家企业，无论是外资、内资，国有还是民营，在法无禁止即可为。中国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也经历了由点到面，由浅入深，渐进式的开放历史。2013年自由贸易实验区试行，2017年推广到全国，全国范围内的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负面清单越来越短，目前只有48项。今年我们还在研究进一步缩减。

三是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我们在加快与国际规则对接，营造一个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首先是要持续提高营商环境的法制化水平，制定实施《外商投资法》的基础上做好三件事。

第一，对现行与准入前国民待遇不相符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第二，对大量实际外商投资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规定

进行相应调整。第三，尽快制定更加细化的配套法规规章，保障《外商投资法》政策落地。我们将提高政策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营商环境。

其次，提高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水平。去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上升了 32 位，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下一步将对标国际高标准，下力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进一步的改善。一个是提高企业开办，产权登记，经营许可等效率，尊重非歧视性规则的国际营销惯例，公平对待所有的市场主体，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

此外，我们还继续提高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我们要进一步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力度，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最多跑一次”，建设国际贸易的单一窗口，削减进口环节的制度性成本，提升贸易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允许更多的领域，外资进行独资经营。

四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我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完善。首先是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一带一路”是中国扩大开放重大的举措，也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一个主动作为，我们将坚持创新理念，推动构建公平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完善经贸合作的机制，发挥经贸独特优势，为发展合作提供制度化安排。

加快推进建设自由贸易区。自贸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区域经贸规则指定的重要平台，我们将着力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加快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

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世贸组织改革是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中方提出了三项原则和五点主张。

三项原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权利益；征询协商一致决策机制。

五点主张：维护多边贸易组织的主渠道地位；优先处理危及世贸组织的关键问题；解决贸易公平问题和回应时代发展需要；保证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尊重成员各自发展模式。

下一步将继续加强与成员沟通合作，共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推动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钱部长。接下来有请刘遵义教授来作精彩的发言，大家欢迎。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刘遵义：女士们、先生们：

很荣幸受邀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言，感谢热情邀请。商务部的前副部长刚刚跟我们全面梳理和介绍了中国的制度开放的内涵，不仅仅是对国际贸易，以及跨境，包括出和进两路的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开放。当然还有中国的关税和对外的这些商品和服务进口的一些非关税壁垒，也都将大大减少。那外资市场准入也会大大改善，负面清单将大大缩短。还有会取消外资股比的上限要求，开放部门所有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也会被准予，更重要的是会被引入新的流程。所有的企业不管所有制结构，都会拥有国民待遇。

另外，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开放也对于中国居民，对中国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持续的开放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有新的一些系统，新的流程机制和形式的方式。中国致力于继续开放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目标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今中国经济已经体量够大，大部分的这些企业也已经足够成熟，可以相互竞争，也可以跟外资企业有效竞争，我们再也不需要这种不成熟企业的保护。如果缺乏竞争力，市场就没法带来社会福祉的提升，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对所有企业的公平市场环境，我们需要有效的、充分的、所有市场的竞争。

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促进《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行，但不是唯一途径。我们政府也可以更加积极主动。比如说可以提供国民待遇以及减少补贴，我觉得准入前国民待遇是非常正确的政策。

刚才讲到《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行，并不是促进的唯一途径，政府也可以采取主动的姿态打造合适的硬件。我给大家举一个公司

的例子。中国目前正在理顺国家石油和天然气的管道系统，把三大国有石油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统一为单一的一体化网络，为所有用户提供平等服务。当然管道网络自身是垄断的，但是需要作为公用事业来监管。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不管这个所有权如何，能够帮我们降低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让所有的用户受益，让上下游的企业在油气行业的成本更低。举个例子，页岩油的勘探企业和石油公司通过网络可以将石油出售给公司。同时可以有更多的原油的供应，包括小企业也可以进入这个行业。国家电网改造方面也是类似，风电、太阳能这样一些行业也可以进行类似的改革。还有国家的公路网络，减少地方垄断，增加开放。

开放的所有权和竞争是两个不同的事，国家的垄断企业也可以带来更私人垄断一样的福利损失，所以执法的重点是看行为，监管行为而不是监管所有权。但是人们不能仅仅去依靠政府，来识别违法者，以及为法律提供执行。如果有必要的话，应该去鼓励那些受到垄断不正当竞争伤害的一些受害者对这样一些犯罪者，包括一些地方政府主体提起诉讼。同时，应该去鼓励宣传高等中国的司法机构去做好案件的判决，做出迅速一致的决定，减少不必要的诉讼。这同样也适用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 2014 年成立知识产权专门的审判庭之后，当然我们中国有更多的一些开放。经济开放可以带来国内的赢家和输家。但是整体来看，开放的净收益是正面的，每个人可以有更好的收益。但是在食物中，自由市场是没法把赢家的给输家，政府应该有这样的职责确保这样一些输家也可以通过再分配的方法获得补偿，这样每个人都可以获益。其中一种政策工具是国家的失业保险制度。用来支持进口或者是

其他国家的竞争性出口，或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者说竞争带来的这样一些失业。

为了适应日益开放的全球经济，我们还有必要来改革所得税的制度。比如说跨境电商怎么来征税。公平的方式是适用领土原则，不管卖方在哪个国家，电商的收入都应该是在购买者地获得。同时，关税如果有的话，也应该给购买者所在的政府，领土的原则也可以消除双重征税的问题。

最后，企业所得税转向地域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政策，同时个人所得税也应该改为属地化征收。这表明省级企业税的总部原则也应该重新考量。在省级的公司所得税的总部原则应该来重新考量，同时又必要的话，改为属地原则。

2019年可能对中国经济会是一个有挑战的一年，对世界经济也是如此。但我有信心，在中国领导的关心下，在中国继续开放的进程中，我们能够出现6-6.5的GDP增长目标。谢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以下为发言实录：

竞争中立或者说竞争中性是一个翻译的问题，这些原理待会儿请 OECD 的始作俑者他们来解释，会最具有权威性。结合中国的实际谈三点想法：

第一，能不能把企业的属性和所有者的属性适当的分开。具体来讲，以后是不是不要再按照所有制的属性来对企业进行分类，把企业头上这个所有制的帽子是不是可以摘下来，不要再贴标签了。有三个理由：

1、把所有者和企业拴在一起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一个表现，或者说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的表现，谁办的企业就是谁谁的企业。到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深化以后，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两权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企业本身是一个法人实体，法人是有独立人格的，独立形象，独立能力的。一定要给前面加一个所有者的属性和帽子，其实非常容易模糊扭曲企业本身的性质。

2、从现实情况来看，你现在要找一個纯粹的国有、民营企业，越来越困难了，现在所谓的央企相当一部分是海外上市，投资者是海外的投资者，你说它是纯粹国有的，你去看它的所有制结构并不是这样。同样的仔细看很多民企，有国有投资者，有是的拐个弯儿也是国有投资者，现在找到一个纯粹的国企或者是民企太困难了，这是正常的，混合所有制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一个常态。

3、竞争中性的问题，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政府，政府的职能是宏观调控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国有资本的所有者，这三种职能按道理是分开的，事实上要分开很难。竞争中立就是针对这种现象，国家办的企业不应该有

超越其他所有者的特殊的权利。从实践来讲，应该把刚才讲的政府这三种权力分开，避免它既是运动员，同时又是裁判员。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要做的是从企业的分类，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或者是什么什么行业的企业。投资者也可以分类，比如说明国有投资者，国有投资者有中央政府国有资本投资者、地方政府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等等，列另外一个表。

第二，对民营企业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潜规则的问题。刚才会前我们交流了竞争中性，这个原则很难有人反对，但是要实施起来很难，为什么？实际上有大量的潜规则，就中国来讲民营企业 and 国有企业要去准入，或者是贷款，大家经常认为还是跟国有企业打交道保险，出了问题有人兜着，或者说是万一亏损了无非是从左口袋放到右口袋，民营企业就不行了，民营企业很有可能有很大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的，实际上不平等。再一个，金融机构本身一直是为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或者为传统业务服务，现在让他给民营企业、创新企业，中小企业是缺少创新能力的，机构、产品都缺乏。按照平等待遇的原则给它贷款，但是它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能力不是那么平衡。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还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比如说国企、民企到底哪个保险的问题，往往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讲，这次应该讲清楚的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也是中央的大政方针，你对民营企业歧视，从讲政治的角度来讲，已经不符合中央的要求了，讲政治的角度来讲也是不合格的，也是有问题的。这个必须要明确。

另外，我们在其他方面也要深入改革，比如说金融体系，应该发展更

多的能够为民营中小企业服务的专业化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这需要进一步的放宽准入，来解决能力不对称的问题。

第三，能不能调整一个说法。我们经常讲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现在顺序也有所调整了，但是还是有做大，对民营企业也说鼓励民营企业做大。从竞争中性这个角度来讲，能不能换一个提法，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还是要鼓励企业做优做强，不一定再提做大。理由如下：

1、企业的技术特点、行业特点不一样，有些企业是做不大的，比如说德国有很多所谓的隐形冠军，规模不大，但是是百年老店，在市场的占有率是60、70%以上，做得很好，他可以做优做强，不一定做大。

2、如果适合做大的企业，如果做优做强了，它一定会做大的，那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做优强强的结果。企业可以做大，你鼓励它做优做强它就会做大。

3、如果政府鼓励企业去做大，很可能产生一个情况是过度的扩张，产生的市场结果是造成垄断。因为在市场经济成熟的过程，反垄断往往是针对大企业，产生的一些垄断行为甚至会分割企业。从中国的实践来看，鼓励做大，有些企业已经很大了，通过加杠杆，借了很多钱规模是很大了，但是最后是优和强了吗？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者从今天讲的鼓励竞争中性的角度来讲，以后从政府的角度对于中国人的习惯的说法，是不是可以说让企业做优做强，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做大由市场来决定，这样会更加符合竞争中立的要求。

谢谢！

3月25日

第七单元 全球经济中的粤港澳大湾区

主持：王安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发言：马兴瑞（广东省省长）

林郑月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崔世安（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下面开始大会第七单元，主题为：全球经济中的粤港澳大湾区。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第七单元主持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安顺先生。

主持人（王安顺）：尊敬的各位来宾，律师们，先生们，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现在进行论坛的第七个单元的议题，这个单元的主题是粤港澳大湾区。什么叫大湾区？我个人的理解，它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一种自然状态，它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当代世界经济主体，是大都市群发展的基础，是国际竞争力和创新力的主体。

我们所看到的著名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都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重要的区域和领导技术变革的领头羊。粤港澳大湾区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珠三角九个城市组成，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7000万。

2018年的数字，GDP10万多亿人民币，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措施，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从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大湾区建设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再到上个月18号，也就是2月18号，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正式发布，可以看到大湾区的进程正在不断的加速。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建设成国际一流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根据规划纲要，大湾区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这些宏伟的目标如何变成现实，如何来把握大湾区建设的机遇，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得邀请到三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广东省省长 马兴瑞先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女士；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崔世安先生。

要谈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我想他们三位更有发言权。首先让我们有请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先生发言。



马兴瑞 广东省省长

马兴瑞：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20届年会。非常感谢本届年会专设全球经济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单元，让我与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崔世安行政长官有机会与来自海内外的朋友相聚一堂，交流研讨，展望未来，这里我谈三点意见：

一、谋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7年7月1日，习主席亲自见证签署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2018年10月23日，亲自宣布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习主席在多个场合都对大湾区建设做出重要的指示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瞄准纽约湾曲、旧金山湾曲、东京湾曲，建设国际一流湾曲和世界一流城市群，建设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做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部署，是党中央大格局、大视野、大气候，推动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开放，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大手笔，这既是港澳从国家发展大局中获得更广阔发展空间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也为新时代广东改革开放再出发带来重大历史机遇，对广东来说，推进大湾区建设，有利于我省发挥毗邻于港澳的区位优势，深化合作，有利于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引领带动我省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我们高兴的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重大国家战略一经推出，就极大的振奋了粤港澳三地人民，迅速吸引了全世界、全社会关注的目光，大家对此充满期待。

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潜力巨大，完全有信心打造成为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世界城市发展也是一部湾区发展史。湾区发展成为技术龙头，成为新技术新产业的策源地，也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世界 60% 的大城市坐落在湾区，75% 的经济总量聚集在湾区，以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日本湾区以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宜人的环境，成为引领全球技术变革，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级和核心动力源，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九个城市，土地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常人口大约 7000 万人，是我国国际化水平领先的区域之一，一是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2018 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过 1.6 万亿美元，超过旧金山湾区接近纽约湾区的水平，拥有 200 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深圳在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排名当中第五，位居全国创新力最强城市榜首，广州 GDP 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一。

二是拥有活跃的创新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内集聚了 4 万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 个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四所世界一百强的大学，R&D 投入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稳居中国首位，TCP 国际专利申请量等领域培育形成了一大批新兴产业。

三是拥有发达的交通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建成了全球的海陆空交通网络，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空港群，去年客运量累计超过 2 亿人次，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累计超过 7000 万标准箱，均居世界七大湾区首位。开通国际客运航线 200 多条，国际海运航线 300 多条。

四是国际化水平。香港、澳门是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和自由贸易港，珠三角九市是外乡都最高的经济区，2018 年外贸达到了 1.04 万亿美元，占

全国的 22.5%。改革开放 40 年来，广东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4470 亿美元，对外世界投资超过 2000 亿美元，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一流湾区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在发展空间、要素集聚、制度安排等方面更具优势，完全有条件、有能力顺应全球发展潮流，承担起代表我国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重要使命。

三、广东将抓住机遇，以大湾区建设牵引带动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今年 2 月 18 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广东将认真落实中央的部署要求，紧紧抓住这个重大历史机遇，与港澳共同把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成美好的现实。我们将大力推进设施的硬连通和机制的软连通，共同打造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加快完善以广深港、广珠澳的内部交通网络，努力促进主要城市间一小时通达，认真落实国家外商投资法，加强与港澳在法律服务、金融、医疗、建筑等领域的规则对接，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政务服务、法治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加快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我们将扎实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共同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把广东较为完善的科研体系、产业体系优势与港澳高端科研力量强强联合，科研合作、国际化水平高的优势结合起来，布局建设一批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打造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推动珠三角先进制造业与港澳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打造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攀升。我们将深入推进开放合作，共同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优化配套服务，充分

发挥广东自贸实验区、中心广州知识群等重大平台作用，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设立区域性、功能性、专业性总部，加大力度引进一批投资额超亿美元的优质外资项目，联合港澳赴海外开展大湾区品牌推介和招商活动。今年4月9日，三地将在日本东京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推介会，欢迎各界朋友积极的参与，我们将积极增进三地民生的福祉，共同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区域，我们将深入推进合作办学，合作办医，强化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和生态环境建设，努力为港澳同胞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三地的居民共享高水平的民生服务。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三地共同的重大机遇，也为海内外各界朋友带来新的巨大商机，我们诚挚地邀请在座的各位都到广东，到大湾区考察交流，亲身体会粤港澳大湾区的巨大魅力，共享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共创合作发展的美好明天，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马兴瑞省长的发言。下面我们有请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发言，大家欢迎。



林郑月娥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很高兴首次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首先我和马兴瑞省长一样，对发展研究基金会安排还有国研中心安排这个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题的环节，让我有机会和各位嘉宾发言，表示衷心的感谢。

刚刚马兴瑞省长表示大湾区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和亲自推动的，现在领导大湾区领导小组的副总理韩正简明扼要的指出，国家战略目标是善用广东九市和港澳互补的优势，深化三地合作，进一步深化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享有高度自治。大湾区是对香港来讲前所未有的机遇，可以让香港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我们的经济增长也将注入新的动力。

大湾区的发展态势良好，这并非偶然，在本月较早举行的领导小组的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韩副总理在开场发言中提到了围绕大湾区发展有三个前所未有的调节，为了相应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就全球经济中的粤港澳大湾区，我希望从全球经济角度来阐述一下这三个地区大湾区的特点。

首先韩副总理表示中央政府对大湾区这个区域发展的高层支持和重视程度前所未有，除了习主席的个人指导之外，还有 20 多个中央的部委参加了大湾区领导小组提供政策指导、有效协调和敲定可行的一些措施，举例来讲，在第一次全会上我们确认了在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措施，在二次全会上我们批准了八项涵盖税收，以及青年创业的措施，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等。目前全球经济充斥不明朗和不稳定的一些因素，保护主义抬头，九个内地城市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在一个国家、两个制度、三个关税区和三法律制度等背景下的开放和互联互通，充分展示了具有不同特征的经济体可以如何开展共同合作实现多赢。

第二，韩副总理表示，三地政府和社会各界参与的热情前所未有，代表香港，我可以很容易的解释原因，尽管香港过去取得了诸多成就，比如说连续 25 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同时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最新报告也将香港评为世界第二个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但是香港不能固步自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我们产业支柱不可避免的面对严峻的竞争，比如我们货柜码头在货物突突量从全球第一下降至 2018 年的第七位，此外经济增长由于劳动力短缺带来挑战，大湾区有 7000 万人口，经济规模已经超过韩国达到 1.6 万亿美元，为香港提供了重大的新机遇。大湾区城市群对于优质服务有庞大的需求，涵盖高等教育、法律、会计、医疗，以及包括一些非常成熟先进的金融服务，比如说募资、风险管理和

资产管理等。香港作为世界排名第三的国际金融中心和服务型的经济体，有能力去满足这样一些需求。

第三韩副总理告诉我们，大湾区即国家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功之后，将在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将发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作用。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的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对于中国来讲，我们正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攻关期。位于中国沿海对外开放的前沿，以及泛珠三角地区作为广阔的腹地，大湾区的发展标志着在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新的尝试，它将有助于加快实现创新驱动的发展，为国家经济创新和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提供支撑，它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的经济性体系，同时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鉴于我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条件和巨大的机遇，我有决心带领香港在大湾区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在此国家中将坚守一国两制的圆得，并善用我们的一些优势，其中我们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在金融方面的优势，金融业在2017年底占香港经济生产总值18.9%，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香港排名位于第三，仅次于纽约和伦敦，我们有世界第五大IP市场，去年募资金额达到36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百家银行中有70家在香港有经营业务，香港在2017年管理的资产总额达到了3.61万亿美元。受惠于内地紧密联系，香港成为最大的离岸中心，我们的资本市场不断满足内地的需求。

为满足大湾区所带来的机遇，采取了很多举措，其中包括创新科技公司和没有盈利的科技公司定新的上市制度，为满足一定条件的离岸基金

提供免税，为债权发行提供辅助，尤其是在香港发行的债券，与卢森堡等落实基金互认，建立金融学院，培养本地和内地人才，大湾区的规划纲要定下了建设国际金融枢纽的明确方向，以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大力发展特色金融产业，我期待香港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规划纲要特别强调在大湾区发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虽然科技创新在2017年只占香港GDP的0.7%，总研发开支也只占GDP的0.8%，但我认为香港大有潜力为大湾区发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做出贡献，并从中受惠。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在于我们本地的大学，其中三所位列全球前50，我们两大旗舰机构香港科学园以及数码港的科技转化能力，我们的法治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我们的国际联系，自商人以来本届政府在过去20个月推出许多政府项目，投入了130亿美元，以提高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能力，并提供额外的税务扣减以鼓励私营企业投资研发。虽然这些措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取得实际成果，但我们乐见海外著名机构非常希望与我们本地大学合作，在科学园两个分别有关生物科技，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科技创新平台设立研究中心，在过去的几个月内，我见证了本地多所大学与海外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包括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英国的伦敦学院，德国的扶老恩斯研究所等等，香港特区这些工作将有助加速在大湾区内建设主要科技基础设施，推动跨境和跨学科的合作研究项目，并加强产、学、研的深度整合。

此外，香港具有深度和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可提供私募基金直接融资，或通过上市筹集资本的渠道，有助推动科技成果的商业应用。我认为大湾区不仅具有潜力成为东方的硅谷，更可以成为具有硅谷和华尔街特色的城

市群。

女士们，先生们，我希望引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规划纲要前沿中的这句话作为总结，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城市，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香港期待未来与广东九个内地城市和澳门合作，以及在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有共同愿景的企业和机构紧密合作，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林郑月娥女士。下面我们有请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崔世安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崔世安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崔世安：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首先衷心感谢中国发展论坛的邀请，以及精心的安排。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这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了，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了

全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国家重大的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承担了准备经济增长的方式，希望成为全球的创新基地的使命，为澳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全力配合国家的部署，加强与各个方面的密切沟通联系，全深化合作。下面我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规划纲要一方面是对过去 40 年来国家改革开放发展成就的肯定。另一个方面，为了适应国家发展的建设，新一轮改革发展蓝图，必将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深圳及珠海是过去 40 年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对国家改革开放做出了历史的贡献，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是我们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要素集聚，国际化水平领先，经济发展良好，在国家大局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乃至世界引领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规划纲要的公布体现了国家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创新和抱负，具有深刻的内涵。

第二是国家对澳门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优势肯定。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建立城市群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的时间，进一步密切与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澳门人到内地发展以及内地朋友到澳门发展，说明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重点就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的发展及保证长期繁荣稳定，并进一步发挥粤港澳在改革中的先进作用。去年是国家改革开放 40 周年，习近平主席在澳门访问时，充分肯定了国家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和贡献，明确的提出了港澳对国家改革开放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明确提出了港澳的最大优势就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因此参与大湾区建设，应该的思考和明确的一国两制最大

优势的实质内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大湾区发展建设中更好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为澳门参与国家发展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建设大局，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国家对澳门的定位，实现经济制度多元，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重大的历史机遇，国家十二五和十三五的规划，均对澳门行政区明确定位，为世界旅游中心和国家项目合作平台，在这个基础上使其规划纲要要赋予澳门新的使命，第一是以建设中国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基地；二是为建设大湾区发展的四个中心城市之一，发挥引擎的作用；第三是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中作为一个支撑点；有这一些的建议，是国家对澳门的期待，更是澳门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积极主动，全力以赴的参与大湾区建设，要在国家的新一轮发展中伟大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而且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国家对澳门的定位，实现经济制度多元，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的发展。

第四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为粤港澳三地带来全新的发展机会，也对三地深化合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要加强把握好这个机遇把握好这个有利条件，粤港澳三地发展的问题也十分复杂，当中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坚持一国的前提下协调平衡、两制的差异，不可避免对要素自由流动成长，推动大湾区的建设就要解决这些问题，澳门在制度创新等方面与大湾区的兄弟城市共同探讨，以先行先试的创新合作，寻求实质性的突破。从澳门的内部来说，澳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人力资源非常有限，粤港澳大湾区为澳门谋划发展，国家政策致力为澳门提供空间的

发展，深化区域合作。

第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是时代的新命题，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要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四个更加积极主动的重要知识结合起来，与合作共赢打造统一的市场，使中国改革开放浪潮中当好经济作用。各位来宾，习近平主席去年来澳门访问团的时候，主席明确了在广东，在2月18号规划这个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是一个时代的命题，我们必须准确领会这个命题的思想、内涵和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实质意义，与习主席关于四个更加积极主动的重要指示有机结合，有效落实，必须有时代深意，发挥了站位和大局，必须坚持国家利益之上，大局利益为重的原则，与大湾区重点城市共同探索紧密合作。

最后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大湾区建设今年是开局之年，是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20周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积极准确的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制度办事，澳门特别行政区将广泛深入学习习近平主席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的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和大湾区的建设战略意图，发挥澳门所强，国家所需，共同推动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开放引领作用，为推动形成国家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推动一国两制事业的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崔世安先生。下面我们进入主题的第二个环节，对大湾区的建设进行讨论。一会儿我们一个是从网络上看看朋友们提来了什么样的问题，再一个我们先看看各位女士、先生朋友们举手发言提一些个问题。好，举手的？

提问：谢谢。我叫麦林，是太古集团的，我想问一下林郑月娥和马省长问题。刚才讲到了在所得税方面的一些措施，能够让在香港的一些人才到大湾区工作、就业、落户更有吸引力，那香港现在已经基本上充分就业了，在服务业又有一些人才的短缺，那有哪一些政策的考量去让这些更有技能高素质的这些人才在广东这一侧的人能够到香港去工作？

林郑月娥：非常感谢麦林您的问题，确实没错，我们现在香港基本上是充分就业，我们大概是 0.2 到 0.8 的失业率，应该说现在达到了历史新低。那在讲到税收方面的一些新政策，我们会有一些补贴，去确保香港和澳门的地区到大湾区工作，我们的所得税是按照昂奥的水平去征收，不会更高，因为这是对港澳人才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人才非常非常的重要。同时我们也在去推进香港的人才到比如说技术这块到大湾区去工作，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也在吸引内地和海归的人才到香港工作。对于香港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优才计划和技术移民的一些技术，我们去年是推出了快速落户，对于研发和技术机构他们吸引内地的人才有一个配额制，它是一个预审核配额，他可以全球来招募这样的人才到香港去就业和落后，这是我讲的政策中的一个例子。

还有一块是为了解决我们人才短缺的问题，我们自己香港也需要去引入技术。我知道太古也有建筑房地产行业，我们政府现在在去做一些建筑的推广 MIC 的项目，但是这个 MIC 的项目我们设施建起来没有太大的场地去做，所以我们觉得大湾区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跟大湾区里的这九个城市合作一起去建设，这是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在跟广东这一侧去形成协力，解决我们香港自有的一些问题，同时实现共同发展是一个很

好的方法。

提问：IDG 熊晓鸽，我觉得大湾区是一个蛮激动人心的计划，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地方缺一个东西，很重要的，就是在美国之所以有硅谷，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有非常强的风险投资合作 PE 的规划，我觉得在咱们的湾区可能在这方面更加加强一点。刚才特首说吸引人才，吸引人才是好事，但是真正吸引它的是有风险投资基金去做投资。第二在深圳、香港都有创业板和中小板，但是我想这个是不是更好一点成功的退出，当然现在上海也在搞科创板，怎么办这几个板块和股权投资基金、私募基金结合起来，这可能对我们做投资来讲是希望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谢谢。

主持人：您这个问题是提给谁的？把这个问题就给省长，不叫他闲着。

马兴瑞：刚才太古集团提的问题，包括熊晓鸽提的问题有一些相近之处，刚刚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已经回答的很清楚，我想从目前大湾区的情况来看，它是香港的一个非常优势的地位，又是现代服务业目前在中国的版图上也是一个最发达的区域，所以说这个人才能够流动起来，应该说是当前的当务之急，尽管香港和珠三角九个城市缺这方面的人才，这是中央政府给出的政策不仅仅是对香港，对海外的这些专业人才都享有同样的税收政策。所以这个政策不仅仅对香港和澳门，对于其他的海外我们也是可以参考这样的政策，所以从这个角度吸引人才还是有政策支撑的。

第二，就当前的情况来看，特别是珠三角九各市，在金融业和其他的现代服务业方面，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市场需求，这是吸引人才很重要的方面。晓鸽刚才讲的就是一样，现在我们当前的市场的主体广东省如果全省来看，我们超过了一千万我们定的个体工商户企业数，包括外资、港澳台

的企业，我们超过了一千万户，占了中国的十分之一还要强一些，这些企业当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创新型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不仅仅需要强大的金融服务，也需要一些人才的服务。金融服务当中，我们应该说这个湾区现在在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无论是PE、VC方面，也是正在迅速崛起的阶段，就是来源于市场主体的动力和活力，它是完全可以支撑的。

第三，广东，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它比较优越的气候环境和交通环境，应该说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到这儿把金融业、投资业能够助推现代产业。所以说我还是充满信心。

提问：早上好，我有一个问题，也想点评一下，包括马省长跟林郑月娥长官都可以回答。最近我们公司建立了在广州的一个研发中心，马省长您可能知道，我们还是很自豪的，因为我们对这个大湾区的政策是非常有信心的。我的问题是问刚才省长讲到的，战略的定位，以及软硬件的配套，作为一个创新中心，它不是一个重资产的，但是连通性是非常看重的，就是有相应的一些合作方的连通在这个湾区里头，包括我们做生物科技做材料的这样一些企业，我们觉得可能在这块大湾区是一个热土。刚才林郑月娥长官也讲到了，这方面的优势，比如说我们跟香港理工大学合作，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构建合作的桥梁，能不能再重点突出一下，特别是在软性条件的支持方面能提供什么吗？

林郑月娥：非常感谢您的问题，讲到互通互联，我希望香港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发挥。如果我们看大湾区，现在我们硬件的连通已经是非，去年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跨境交通的项目缩短了时间，一个是高铁，我们正

好有中车的，还有港铁的领导在位，他们负责去运营这样的一个项目，在45分钟九龙就可以去到深圳，港岛也可以很方便到深圳。第二个项目就是粤港澳的大桥，是习主席亲自去督导开通的，所以它能够让珠海让这样的一些连通45分钟就可以到达，当然还有其他的陆地和海运方面的一些交通联系，所以这块我不担心，我们现在是着力的去促进资本、人才、信息、数据和医疗技术方面的一些要素的流动。我们提到要去比如说一些医疗的数据，不是说个人患者的数据，而是说生物研究的一些数据，包括一些标本，能够去尽快的方便的转移，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软性的一些支持，我们也希望能够落地。当然刚才提到的一些崔先生讲到的税收方面的政策也会去更好的理顺两端的关系。如果你是在香港有员工，但是每天要跨境到广州去上班，去这个中心里头工作，只要他在那一天不超过24小时，从税务角度来讲就可以是归香港的税收去来处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软性资源的体现。

马兴瑞：谢谢你提这个问题，您提这个问题是很关键的问题，目前确实大湾区作为要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我是完全赞同这一点，现在看不是缺乏硬件条件，也不是缺乏一些基础设施的条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规则、我们的软环境，我觉得这个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是力争于民族的特色化，我们是联合打造这个软环境任重道远，特别感谢您在材料、医药方面布局在广东，这个市场需求是足够的，但是确实我们在配套的软环境上还有更大的作为的空间，包括我们最近出台的外商外资投资十条，实体经济十条，民营经济的十条，包括金融的十条，这些都是为了打造软环境。谢谢您。

主持人：网络上已经有好几位朋友提了若干个问题，我想现在先把这个问题分配给崔世安先生，网友是这样提问的，他说请问崔世安先生，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有何独特性？现在请崔特首给大家解答。

崔世安：谢谢你的问题。澳门特别行政区主要问题我谈谈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制度的优势，一个就是我们的定位。澳门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基础上严格按照宪法制度，是有一个独特的优势，我们已经嗯走过了20年，成功运用这个优势发展澳门的经济，改善民生。第二个方面就是定位，澳门在中央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作为旅游休闲中心，培育一些国家的项目孵化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发挥更好的左右，就是把葡语系国家和大湾区联系起来，能够发挥得平台作用更进一步，所以我相信在未来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大湾区的工作里面我们是积极参与，希望能够根据相关的规定能够进一步发展。谢谢。

主持人：各位朋友，刚才马兴瑞省长、林郑月娥特首、崔世安特首围绕着落实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力来推进大湾区建设和发展向大会做了精彩的发言，与此同时也就有关朋友的提问，特别是提出的问题分别的给出了一一的解答，由于时间所限，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的。但我相信大湾区的深入的讨论在我们的现实社会场景当中将会继续进行下去，三位领导的发言和解答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进一步的了解大湾区，关心支持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以及积极的参与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最后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三位领导的精彩发言和对问题的解答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这里也衷心的祝愿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

展起好步、开好局，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新的成就，本单元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第八单元 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

主持：马建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

发言：阿敏·纳瑟尔（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

潘彦磊（道达尔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高瑞宏（加拿大宏利金融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

总结：蔡澈（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集团全球总裁）

李伟（论坛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女士们，先生们，下面开始大会第八单元，正式会议的最后一个单元，主题为：开放合作互利共赢。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第八单元主持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先生，有请。

主持人（马建堂）：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经过两天半内容丰富、节奏紧张的深入讨论以后，现在我们进入本次论坛的最后一个单元，这一单元的主题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在深刻的调整，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也遭遇一些波折。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妥善的管控和化解分歧，如何求同存异，异中求同，特别是如何通过深化合作，扩大利益交汇点，这都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今天这个单元是最后一个单元，但是我们中国也经常把最后一个单元叫做压轴戏。今天的压轴单元一定非常精彩，本单元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三位在国际合作领域有非常丰富经验的嘉宾来分享他们的观点，他们分别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 阿敏·纳瑟尔先生；道达尔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潘彦磊先生；加拿大宏利金融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 高瑞宏先生。对不起，我还需要提醒一下，本单元是最后一个单元，单元以后我们要进行间断的闭幕式，所以三位嘉宾你们各自的发言时间只有五分钟。好，我们首先请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总裁首席执行官阿敏·纳瑟尔先生发言，有请。

阿敏·纳瑟尔：各位阁下，尊敬的个贵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北京和各位参加高层论坛，回望中国高层论坛 20 年前，中国还在向进入世贸组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事实证明这也为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中国不仅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同时也为发展和发达的经济体创造了巨大的增长机遇。如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个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预计，这一倡议的成果也会和以前一样，事实也将证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及相关合作国家是互惠互利的，可以使全球 60%的人口互联互通，这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显然充足可靠、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深远的战略性蓝图当中，能源构成这方面如果能获得更多关注，将会让这一重要领域受益良多。我明确表态，并重申我的看法，石油和天然气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在中国，乃至全球的能源结构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哪怕替代能源发展取

得进展，因为毕竟它的基础规模还非常小。

我想强调的是在各种相互竞争的能源种类之间，石油天然气是最有优势满足社会对能源提出的充足可靠，以及成本可负担等方面要求的能源。但是我们也完全认同我们这个行业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降低碳排放，同时我也要强调我们将全身心投入专心致志的朝这个目标努力，我认为更清洁的石油天然气和新型的正在发展不断发展的能源结构能实现经济和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这样的现实也是为沙特减少石油碳排放成为我们优先及最高的工作事项之一。事实上我们为这大量投入了研发、时间和资金，开发清洁燃料技术，利用石油开发新的燃料，通过油气行业倡议组织促进国际合作等等，今天我们中方的合作伙伴中石油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们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以及沙特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我们相信中沙之间更为密切的合作将对中国的未来安全至关重要。我们正在积极与多个合作伙伴在中国展开合作，最近我刚刚访问过辽宁的华锦，华锦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立足“一带一路”让沙特中东油气资源开展互联互通是伟大的创举，沙特阿美已经准备好在这一战略举措中发挥主导作用。包括投资与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享有稳定可靠的长期能源供应，我们认为通过“一带一路”促进互联互通，并不仅限于推动贸易和商业，还为文化互联互通创造积极的影响，为所有人的互惠互利，为世界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谢谢！

主持人：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道达尔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潘彦磊先生发言，有请。

潘彦磊：各位阁下，嘉宾，我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来介绍油气，那刚才

的阿美已经做了这方面的介绍，所以我想首先要感谢论坛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来谈论开放与合作。

中国政府的目标，在昨天和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嘉宾都已经谈论到了。我们相信开放与合作能够带来互惠互利，我们实际上在 1924 年是在中东开始创业的，那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全球一体化的能源生产商和提供商，我们分享了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专长、经验和我们公司的伦理，在多个市场上和多个国家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所以我们充分的理解开放和合作，能够为我们带来的利益，而且我们也是受益者。

显然中国是道达尔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在四十年前，中国刚刚开始向世界开放市场，道达尔就成为第一个国际能源公司，在中国建立海上勘探和炼油业务。在过去这些年，我们很多成功合作的经验，比方说我们和中石油合作，在 2016 年在内蒙古进行了一个合作的项目，并且向北京开始输出天然气，这也为北京的空气污染的防治作出了贡献。

另外我们是一家负责任的企业，我们希望能够带来清洁、可靠和可负担的能源，主要是为了应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我们的战略和中国的政策是高度一致的。在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积极的推动能源转型来减少碳排放，并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挑战，所以中国在积极的发展天然气，以及液化天然气，我们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可再生能源领域也是一个领先的企业，中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平台，可以使我们为中国的供应传统的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另外我想说，我们和中国的合作过半也不仅局限于中国，比如说我们

在南美洲、非洲、中东等等都有合作，“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我们在亚麻尔的项目就是和国石油公司，还有俄罗斯的一家公司在亚瓦尔半岛的一个合作项目，那这个项目还获得了中国银行的大力资金的支持，从 2017 年末，亚麻尔项目就能向中国市场输出液化天然气。

说到如果没有开放的政策和中国的合作伙伴的合作，如果没有开放政策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面临的是越来越不稳定，全球化也给全球上亿的人民带来了脱贫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战争，所以我们的中国的国企，以及在中东、俄罗斯，还有在美洲都有很多的合作项目。那这次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第 20 周年，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开放和合作来进一步推动互利互惠，谢谢。

主持人：感谢潘彦磊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演讲。我们中国和道达尔公司有关系，和沙特阿美公司有关系，还和壳牌公司有关系。接下来我们有请加拿大宏利金融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高瑞宏先生发言。

高瑞宏：主持人还有各位朋友，很高兴能做这个最后环节的发言，其实我们应该要关注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也是能够很好的展示如何通过合作和开放来应对共同的挑战。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口老龄化以及养老金的不足，如今有 9 亿人是在 65 岁以上，在 2050 年这个数字还会继续扩大。资金的缺口大概有 70 万亿，所以人们在储蓄的时候，可能对未来长远的退休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这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也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相对竞争力，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政府需要来解决的负担，在未来几年中国政府可能需要面对，中国首先会在 2050 年之前会占退休人员的三分之一，另外退休人员需要相关的人去提供对应的养老金的支付，那现在这个

依赖率会不断的下降，目前加拿大 120、澳大利亚和美国 130，所以中国的退休挑战我们需要通过三个步骤来解决，通过全球的合作来解决。第一我们要非常强的雇主缴费的这样一种机制，还有个人养老金的资助，不是所有国家都有比较大的退休差距，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来吸取教训。同时我们可以去为退休储蓄来制定累进税的一些政策，给公民政府带来一些好处，如果存在经济上的激励，个人和雇主行为都会发生一些变化。第三我们不要单打独斗，像宏利这样的企业有优势，因为我们在新兴市场和人口老龄化应对过这类挑战，几十年我们的合作也已经证明可以为政府去提供化解这些问题的方案，另外在人寿，在养老金、资管这块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强大的业务基础，我们在亚洲已经有一百多年的从业经验，实际上我们第一份卖出的人寿保单是 1997 年在上海，然后我们建立了跟中化的合资企业，中宏人寿，还有在 51 个城市和 14 个省我们就有人口超过 15000 人，当然我们需要有本地的支持，我们对中国本地的承诺在养老金和退休计划这块不断的跟中国政府合作，当然我们也需要跟监管机构去配合，需要通过进一步市场开放，通过双赢的合作来实现。

我们在讲到双赢合作条件的时候，我觉得从我经验看来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各方合作他们必须要能够为各方参与都创造价值。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机制，合作的成功几率就会更高。退休以后有很多的价值，参与在中国退休的这样一个市场将会共享这样的一种成功。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去有信任，信任对任何合作关系都非常重要，你必须能够去把你的钱有信心的委托给他人去帮你来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本地的合作伙伴中化集团，就是我们险资这块，还有泰达是我们做资

管的中方合作，我们建立很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们做这样一种开放双赢的合作，是保证合作成功的重要依托，我们需要有坚持，需要有承诺，有时候成功的价值合作最好的方法就是来收回控制，但是解决退休挑战并不容易，我们需要坚持才能去确保有持续的收益。

举个例子，我们有知道中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你想走的快你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跑的远就要一起跑。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高瑞宏先生的演讲，他在短短的五分钟讲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就是养老保险问题。中国目前 60 岁以上的人口 2.5 亿，再过几年，我也要进入被养老的队伍，所以我们热切期待包括像加拿大宏利那样众多的保险企业进入中国保险市场，提供更好的保险服务。

刚才三位先生在很短的时间里给我们谈了合作，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三位先生。

根据会议安排我们要进入总结环节了，我们有请两位论坛的主席总结，工作人员把主席台换一下。有请李伟主任，有请蔡澈博士。

首先有请本届论坛的外方主席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长、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集团全球总裁蔡澈先生做发言，有请。

蔡澈：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李伟主任，卢迈秘书长，以及来自国研中心的各位领导们，首届中国高层发展论坛是 20 年前中国入世之际举办的，此后国发论坛并在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中持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国发论坛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平台，他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对外交流的平台。今天我很高兴看到有很多熟悉的朋友在场，同时跟我们一起分享在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了解中国发展的愿景，

我们也有很多的收获满载而归，比如说我们了解了结构改革、财政政策、制造业、金融业、改革方面的一些见解，当然收获远不止以此，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信心，中国对外开放，毫无疑问中国未来 40 年将比过去的 40 年更加辉煌，中国具有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条件，包括有雄心的人才，快速接受新技术的消费者，以及以推动经济增长质量为首要目标的政策导向。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比中国更能传播和去接受新趋势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包括汽车行业在内各个行业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引擎，借鉴我在戴姆勒的经验，我们和中国市场有着坚定的信心，这也是戴姆勒进一步扩大在华投资的原因，它已经成为我们第二个家园，我相信我们替所有外方代表对这次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信心，所以我代表李主任感谢主持这次论坛的领导。谢谢。

主持人：谢谢蔡澈先生的发言，他的发言就是这样几个字，继续改革开放，再创发展的辉煌。谢谢蔡澈博士。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伟主任做总结，大家欢迎。

李伟：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要感谢蔡澈先生刚才做的非常精彩的总结，他作为本届论坛的外方主席，我的搭档，感谢他在这次论坛当中所做出的贡献。到现在为止，我们第 20 届发展高层论坛圆满完成的各项论坛，可以说接近尾声了，我想在座的一定会同意我们共同来说，这一届的论坛现在达到了我在开幕式上所提出的论坛的目标和价值所在，就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在疑惑中增进信任，在忧虑中增强信心。我们为这个目标价值的实现我们共同以掌声对我们自己表示祝贺。

我在昨天开幕式当中还提到，20岁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跨入成年人之际，对论坛来说意义非凡，我们这个发展高层论坛在大家的共同关心和支持下，可以说是由小到大不断成长，咱们可以自豪的说，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发展合作与沟通对话的大平台。如果说对这个论坛的成功如果简单的概括的话。

我想用三个词，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词儿它是中国深层的文化和哲学对人类社会成功指引的可以说是经典的总结，中国大约在2500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孟子，中国的大军事家孙臆等等，都对这个成功三要素做过系统的表述，所谓天时，它是指成功的机遇；所谓地利它是指成功的环境条件，所谓人和，它是指取得成功的综合实力，也是关键所在。

对论坛来说，这个“天时”是因为我们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论坛应21世纪的到来而应运而生，论坛应中国进一步开放需求而面世，论坛应有效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兴盛，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各国互利共赢带来的巨大的这一历史机遇，很难想象，实际上也不可能论坛取得如此的成功。对世界，尤其是在经济界、企业界有如此的吸引力。这是天时。

所谓“地利”，是论坛始终致力于服务于中国这片机遇之地。20年前，论坛创办的初心正如这个论坛的名字，是围绕中国发展提供的高层次的对话平台。随着论坛的成长，研讨的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发展的范围，论坛的名字可以说名不副实了，似乎叫中国高层发展论坛更好一些，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论坛与论坛的宗旨，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我感到现在更为贴切了。论坛也将一如既往的扎根于中国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为中国

与世界共同发展提供机会平台，同时积极就各类发展问题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这是地利。

所谓“人和”，更重要了。首先我想人和至少有四因素吧。

一个是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高层的高度重视和参与，自第一届以来，朱镕基总理开始就形成了两位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参与，包括发表主旨演讲，会见外方的主要代表，这样一个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次同样如此，而且中国的主要部门的负责人，综合部门，发改委、财政部、央行等等，直接参与和大家对话，这一届参加的中国副部级以上的领导，据不完全统计有 50 多位，这充分体现中国政府继续扩大开放的核心，共同发展诚挚的愿望，我想在世界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国家一个论坛游这么多领导人和部级领导直接参与和大家对话。

第二个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外企业界代表一直是我们发展高层论坛的主力军，这是论坛的一大特色，今年的论坛继续得到中外企业界领袖的有力支持，来自境外的企业界代表，所谓世界五百强也好，五百大也好，就有 96 位，中国国内企业代表有 82 位，企业家参会规模到今年是最多的，我跟参会的企业家代表开玩笑说，论坛的含金量企业界是最大的体现，也是我们现在论坛能够继续这样办下去的重要保证。他们有一个数字，不准确，说如果把我们参加论坛的企业界的产值、资产额或者管理的资产统计在一起的话，超过任何一个大的经济体，超过美国，20 万亿。如此多的企业界的领袖集中三到四天的时间在一个地方开会，在当代世界可能也是少有的，这体现了大家对论坛的价值的肯定和认可，当然也是充分反应了大家对论坛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据我了解，在这个平台上很多企

业家平时难得一见的一些老朋友在这个场面又取得了见面，而且好多企业界的领袖跟我说，他们又在这种场合，难得的场合又结识了很多新朋友，钟西复明（音）先生他在宴会的时候跟我讲论坛很精彩，但是我又不得不老是出去去会见一些朋友，两边都难以同时兼顾，当然我们作为会议主持人，我们非常愿意推动这样的工作，为大家的业务开展交流提供更多的方便。今年论坛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家知道今年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但是论坛新增参会的企业数量达到了历史新高，有 20 多家，我点少数吧，安盛（音）集团、宝马集团、慕尼黑（音）保险、三井（音）物产株式会社，凯雷巴特兰（音）集团等等，这是值得高兴得，我们又增加了新的合作伙伴。

作为企业来说还有第三个人和的亮点，就是我们有宽广的事业和高水平的思想交流，这很重要来自于我们国际组织、智库以及我们经济界著名的人士，今年我们国际机构的负责人，比如说讲亚投行的金立群先生，当然可以解释一下古利亚先生报名参加的，中国的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古利亚先生要参加一些活动，所以来不了了，可以理解。原来一直亚行的委联先生本来每年都参加的，在论坛召开之前，据说他身体是有些不适难以参加。亚行我们参加了一个首席经济专家，亚行现在没行长。我们世行行长参加，但是世行副行长这两天就到北京。还有我们怕帕斯卡尔拉米先生，劳伦斯先生，都是连续多年参加我们论坛的老朋友，另外还有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社会统筹部的部长桑达贸先生，也是我们论坛的新朋友，他不是作为总理部长参加会议，而是作为 G20 全球金融治理专家主席团主席的身份来参加的。

我们这个论坛从第一届开始有一个考虑，就是我们原则上是不邀请政界的领导人参加，因为政界领导人参加的世界各种论坛太多太多了，另外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是政界领导参加的话，那可能就把我们企业界这个主要的主体给淡化了，所以我解释一下。同时还有上百位中外的知名学者也出席了论坛，也包括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迈克尔·斯宾赛斯、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斯蒂格利茨、埃德蒙·费尔普斯，以他们深邃的思想见识使我们的论坛焕发出魅力。

第四个人和的影响，我们论坛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我们论坛举行了40多场峰会，安排了各类其他的活动，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有260多位代表围绕着各类会议直接参与了讨论，有2500多人参加了论坛的各项活动，还不是人次，因为这么多系统都参加是2500多人，这些讨论通过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各类媒体的传播，在社会公众中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反响，也正是由于现在通讯的发达，我的手机上都收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各种信息，他们比我知道的还快还多。

很多中国的媒体都将论坛的报道都放在了报刊和网站的头条，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我看对这个论坛进行了充分报道，什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有一个统计，我们今天论坛官方微博浏览量已经达到了5.5亿次。所以说人和至少这四个方面是支撑了我们发展高层论坛的成功。

当然了，要让一个论坛保持20年的高标准和吸引力，需要持续不断的创新，今年论坛在形式上也做了不少创新，一是将更多论坛代表的声音传

递给中国社会，以增加理解信任，在论坛举办前，正式开幕前，我们设立了 CDF 洞察系列栏目，开展了数十位有代表性的国际影响力的外部学者、知名企业家，就大家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比如中美关系，中国与全球化，中国金融业开放等话题进行评论和分析，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传递论坛与会代表的观点和心声，我相信他们所谈的一些观点和认识，增加相互理解，是驱散焦虑和疑惑这种阴霾的阳光。

另外的创新方面我们让更多代表充分深入表达，以往论坛上有不少代表反映发言时间太短，今年论坛新增创新环节 CDF 奖，12 位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学者在 23 号经济峰会上与听众分享了他们对中国发展、科技创新、文化氛围等方面的观点和故事，这个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的高等重视，他们在会场做了周密安排，取得很好的效果。

三是继续丰富拓宽论坛议题，增进了多元视角的交流讨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相互协同促进，论坛的一体设置也反应了这一点，我们今年在文化社会方面以及社会十分关心的青年女性发展这个问题上增设了相关的议题，这些多元视角的讨论也进一步丰富了论坛的内涵，提升了论坛的影响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高层与中外企业界国际组织学术界的对话平台，这是属于大家共同产品，也需要大家共同建设、共同维护，在这里我们特别对那些 20 年、15 年、10 年持续参加论坛的嘉宾表示感谢，是他们用心铸就了论坛的优良传统，塑造了和谐的交流范围，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寄托和纽带，我们参加论坛还没有满 10 年、15 年的朋友，未来我们还有更多的 10 年、20 年等着大家。

各位嘉宾，第 20 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即将闭幕，再次请允许我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参与论坛的朋友表示感谢，向以蔡澈为代表的外宾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卢迈先生为首的团队，这个团队 200 多人，其中 150 多位都是大学方面的志愿者，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论坛宣传报道做出贡献的新闻界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据说新闻界参与报道的朋友有 500 多人。向所有与会的工作人员以及为我们的会场提供热情周到服务的钓鱼台的领导和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按照惯例，我们对 2020 年的下一届的论坛的召开的时间做一个预告，根据现在的安排，想考虑在明年的 3 月 21 日—23 日我们召开第 21 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李伟主席、李伟主任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总结梳理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小到大长盛不衰，影响力、价值力不断增强的主要的原因，李伟主任刚才的总结讲到了三个数据，我想给朋友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参加会议 2500 人，5.5 亿人次关注，5.5 亿可不得了啊，参加会议的企业家们你们的企业的增加值 20 万亿，我提议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蔡澈外方主席，感谢李伟主任中方主席他们精彩丰富的总结。到此，第 20 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就要圆满地、顺利地结束了它的所有议程，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把这句话改一改，作为临别的赠言，钓鱼台水深三尺，不及吾辈送君情，待到明年春暖花开时，我们再相见。谢谢！

现在请允许我宣布，第 20 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胜利闭幕，谢谢诸位。

（文字由网络上整理而成，未经发言者与论坛主办方审核，转载或引用请谨慎）